

左營薛家源流與薛國樑的海外發展

撰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何義麟
嘉南藥理大學退休助理教授 王耀德

摘要

左營薛家為高雄地區的大家族，其薛家古厝更是南臺灣極為珍貴的古宅，而族系的薛國樑為旅日重要僑領，也是在日臺灣人的代表性人物。探索薛國樑的生命故事，不只是他在海外的奮鬥事蹟，考察孕育其生長的臺灣原鄉與家族歷史，亦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課題。本文以左營薛氏家族源流和薛國樑成長歷程，以及戰後他在日本發展與成為僑領之後，如何回饋家鄉宗親等事蹟，作為研究重點。

本文藉由文獻史料檔案、家族戶籍資料、口述歷史及田野調查紀錄等，一方面掌握左營薛家的家族史，以明瞭薛國樑到海外發展的動力來源；另一方面在兼顧旅日華僑和在日臺灣人身分之歷史脈絡中，探究他如何展現其商才與建構人際網絡的努力，試圖勾勒出其一生完整而具體的行跡，這也是探討海外臺灣人值得參考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左營薛家、薛國樑、旅日華僑、東京中華學校、在日臺灣人

本文承蒙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2024 年「寫高雄——關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之鼎力支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謹此申致謝忱。另外，對於薛氏文教基金會與薛家族人提供諸多指導與協助，特此一併致謝。

投稿日期：2026 年 3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



The Origins of the Zuoying Hsueh Family and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Hsueh, Kuo-Liang

I-Lin Ho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ao-Te Wang

Retired Assistant Professor,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Abstract

The Zuoying Hsueh family is a prominent clan in the Kaohsiung region; their ancestral residence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historical dwellings in Southern Taiwan. Among the lineage, Hsueh, Kuo-Liang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overseas leader in Japan and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there. Exploring his life story requires not only an account of his struggles abroad but also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ancestral home and family history that nurtured his growth—an indispensable subject of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nealogical origins of the Zuoying Hsueh family, the formative years of Hsueh, Kuo-Liang, his post-war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his hometown and kin after becoming a community leader.

By synthesizing archival documents, famil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cords, oral histori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this study aims to achieve two primary objectives: first, to master the family history of the Zuoying Hsueh clan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behind Hsueh, Kuo-Liang's overseas endeavors; and second, to investigate how he demonstrated business acumen and constructe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his dual identity as an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and a Taiwanese expatriate. By sketching a complete and concrete trajectory of his lif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offer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Taiwanese diaspora.

Keywords: Zuoying Hsueh Family, Hsueh, Kuo-Liang,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Tokyo Chinese School, Taiwanese in Japan

- 壹、前言
- 貳、薛家從中國大陸到高雄的移墾定居
- 參、跨時代的薛家宗族及家業經營
- 肆、戰前薛國樑的成長與求學歷程
- 伍、戰後的經貿活動與政商網絡
- 陸、旅日奮鬥遊子的歸鄉之路
- 柒、結論

壹、前言

近年，臺灣史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結合新議題的跨域研究也推陳出新，屢見佳作。其中，在人物傳記方面不僅限於臺灣島上，關注對象已延伸至活躍於海外的臺灣人。欲瞭解海外臺灣人的發展歷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將視角回歸到孕育他生長的臺灣原鄉，同時究明其家族群體歷史，進而剖析在境外和島內間相互變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不容漠視的課題。本文主要探討一位臺灣旅日僑領薛國樑（1917～2000）的生命故事，他出身高雄左營廂後，經歷了戰前舊日本帝國統治臺灣的時期，以及戰後臺灣國府治理和日本復興重建的轉換年代；足跡踏過臺灣、中國東北與日本，傳奇一生充滿艱辛奮鬥，過程發人省思。

薛國樑戰前曾赴滿洲國尋求發展機會，再轉往日本留學和就業，戰後定居日本經商，長年更致力於推動僑務與僑教，曾任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東京中華學校理事長，以及僑選立法委員等要職，與林以文、李合珠並稱旅日三大僑領，在日本僑界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不可諱言，薛國樑是在日臺灣人的代表性人物，其生平事蹟也是近現代臺灣史的重要篇章，如此重要的海外臺灣人，至今未見完整的研究論著，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憾。

戰前在殖民地臺灣出生成長，戰後活躍於日本的薛國樑，其事蹟為何會被輕忽，且未能獲得臺灣史學界應有的重視，主要原因在於他被定位為「旅日華僑」，其經歷也大多被納入華僑研究之相關領域；薛國樑擔任日本僑領的成就相當耀眼出色，但相反地原本屬於「在日臺灣人」的身分卻被淡化或忽略。因此若理解薛國樑的人生歷程，不只是旅日華僑的角色，做為在日臺灣人所涉及關聯包括他的家族、其成長歲月與海外發展的歷史脈絡，必須全面詳加檢視，如此才能完整呈現其生平事蹟。

審視相關的文獻回顧，針對薛國樑的生平經歷，雖有若干史料散見於臺日兩地，

但都以簡述事略居多；¹ 另一方面，有關左營薛家的歷史，多見圖像紀錄與薛家古厝之探討，² 較缺乏世代人物的論述，實有加以整合及深入考察之必要。³ 職是之故，本文除以薛國樑在海外日本的事業經營與僑社領導為主題外，時間軸也往前追溯薛氏家族源流以及薛國樑在左營的成長歷程，同時也向後續探他成為旅日僑領後，如何返臺回饋家鄉宗親做為調查研究重點。筆者認為，唯有先將左營薛家的家族史進一步探究釐清，才能真正解析薛國樑戰後在日發跡崛起的歷史緣由和契機。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本研究擬先從薛家祖籍溯源入手，藉由文獻史料與戶籍資料之考察、家族紀錄和口述訪談，以及田野踏查等方法，爬梳整理薛家族系與家業的發展過程，接著探索薛國樑的成長經歷與求學過程，進而闡述其海外奮鬥和返鄉奉獻的具體樣貌。簡言之，本研究議題係以主角薛國樑之人物史為核心，連結左營地方史、薛氏家族史的延伸研究，也是海外臺灣人發展史的基礎研究。

貳、薛家從中國大陸到高雄的移墾定居

一、赤山開臺祖 薛淑仁

追溯薛氏家族移民來臺的歷史源流，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登載內容，以及「高雄市左營區薛氏文教基金會」⁴（以下簡稱「薛氏文教基金會」）之說

1 例如：楊文魁編纂，《日本華僑紳士錄》（初版）（東京：華僑新報社，1993），頁 86；〈薛國樑先生事略〉，收於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二輯》（臺北縣：國史館，2000），頁 456 ~ 459。

2 有關圖像紀錄，可見曾光正，《左營歷史照片暨古文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以及郭吉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高雄：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2012）等書，內容蒐羅不少薛家珍貴舊照，對增進並輔佐史料文字敘述之理解，助益甚大。另外，關於薛家古厝的探討，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已出版，2020），是最具代表性的參考文獻。

3 薛國樑過世後，其長子薛博仁曾撰寫 1 本懷念父親的追思文稿《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東京：私家版，未刊，2000），頗值得參考，惟內容側重自身與家族親友的回憶紀錄，若欲明晰薛國樑真實的一生，猶須參酌史料檔案輔以查核考證。此外，筆者依據這本回憶錄，再參考薛國樑相關履歷及史料，製作成〈薛國樑生平年表〉，詳見何義麟、王耀德，〈左營薛家源流與薛國樑海外發展史調查研究〉，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未出刊，2025）。

4 1994 年 5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設立之正式法人登記名稱為「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高市教四字第 10785 號）。可參考台灣法人網，〈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網址：<https://org.twincn.com/item.aspx?no=3564398>。



圖 1 薛家古厝園內豎立的「廊後薛氏家族源流」解說牌

圖片來源：2023 年 2 月 11 日筆者攝。

明（圖 1），⁵ 薛家開臺始祖薛淑仁（生年不詳～1728），在康熙末期從中國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橫渡黑水溝來臺，落腳於高雄赤山（今高雄市鳳山區北部）一帶定居開墾。

由郭吉清考究薛家先祖薛淑仁及先祖母洪氏（生年不詳～1747）祖墳墓碑，並整理製作薛家赤山祖一世至五世之祖譜可知，⁶ 赤山薛家傳承至第五世時，薛瑞山派下分成左營支系薛九重（薛黨）與臺南支系薛恩二支。主因為第四世之雙親相繼早逝，在家逢變故情況下，成為孤兒的薛九重（1772～1846）乃離鄉背井，隻身投靠嫁到左營廊後陳家的姑母薛屬，⁷ 成為薛氏家族左營廊後的開基祖；而薛九重兄長薛恩則前往臺南，依靠府城親族。

二、左營開基祖 薛九重

赤山祖第五世薛九重童年喪親，孤苦伶仃的他，遂投奔嫁到左營廊後陳家的姑母薛

5 參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左營廊後薛家古厝〉。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40811000001>；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文化資產網，〈左營廊後薛家古厝〉。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heritage.kcg.gov.tw/KhccHeritageWebSite/CulturalAssets/AssetsSearchDetail/0be3a97d-6959-4949-8bb3-d7127b7c280d>。有關薛氏家族來臺源流及其古厝之敘述，薛氏文教基金會曾於部落格刊載較詳盡內容，諸多介紹薛家的書籍或網路文章，大致均引用其說法。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4 月 16 日。網址：<https://sheethub.com/data.kaohsiung.gov.tw/%E6%96%87%E5%8C%96%E8%B3%87%E7%94%A2/uri/31529630>。惟該部落格已下架早期文章，完整內容目前難覓。如本文圖 1 所見，僅在薛家古厝園內豎立解說牌供人瀏覽，由此略可窺知一二。

6 郭吉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頁 4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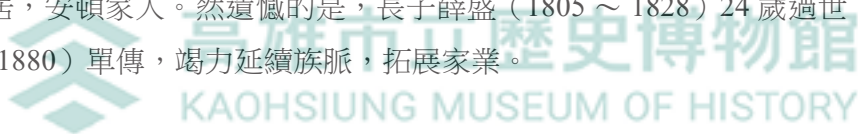
7 針對薛九重（1772～1846）的生平記述，綜覽相關文章皆謂：7 歲喪父、9 歲喪母，年僅 9 歲的孤兒薛九重遂投奔左營姑母。然而，其歲數與喪親年代之計數，與薛氏家族的族譜記載略有出入，這部分尚待考證釐清。

屬，從此定居下來。年幼的薛九重受僱於當地大戶農家為其幫傭、放牛，並從事農耕等各項農務瑣事，幸獲姑母夫家襄助與照顧，加上自身努力，逐漸在廊後站穩腳跟，安家落戶。

關於薛九重姑母薛屬，另有一說名為薛庶。根據廖德宗考察，薛九重姑母夫家為世居廊後的陳家，祖籍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馬厝巷，第一代陳烈於乾隆年間渡海來臺，第二代陳淵豹（1758～1811）娶鳳山赤山的薛庶。⁸

又，廖德宗、洪親慧研究團隊曾訪談陳家後代陳春發，他以陳家祖譜佐證並表示，聽長輩流傳下來的說詞，第二代陳淵豹的夫人薛庶（1760～1836），尊稱庶娘，即是薛九重的姑母，因此研究團隊推論薛九重長大後，除農作外，也協助姑丈陳淵豹家業，逐步建立薛家事業。⁹由此可知，薛九重得以在左營廊後奠定家族基業，陳家亦是不可忽視的助力推手。

薛九重年約 30 歲時娶盧泰（1776～1859）為妻，生薛盛及薛老兩子，並著手規劃興建宅居，安頓家人。然遺憾的是，長子薛盛（1805～1828）24 歲過世，只剩薛老（1811～1880）單傳，竭力延續族脈，拓展家業。



參、跨時代的薛家宗族及家業經營

一、四房分家 躋身名門

廊後薛家經過薛九重與薛老胼手胝足、苦心經營之下，族系繁衍昌盛，瓜瓞綿綿，而家道更是蒸蒸日上，越發興旺。如後述所言，此時薛家不僅擴建祖厝宅第，家族產業也朝多角化發展。尤其薛老之後的廊後第三世（參見圖 2），適逢臺灣從清領跨越至日治的近代化時期，家族齊心協力，將祖業推向高峰，儼然成為廊後當地著名世家，進而躋身左營、甚至是打狗高雄的豪門望族之一。

8 廖德宗，〈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發表於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講座（2022 年 10 月 26 日），頁 23。

9 參見廖德宗、洪親慧，〈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臺灣文獻》，73（1）（2022），頁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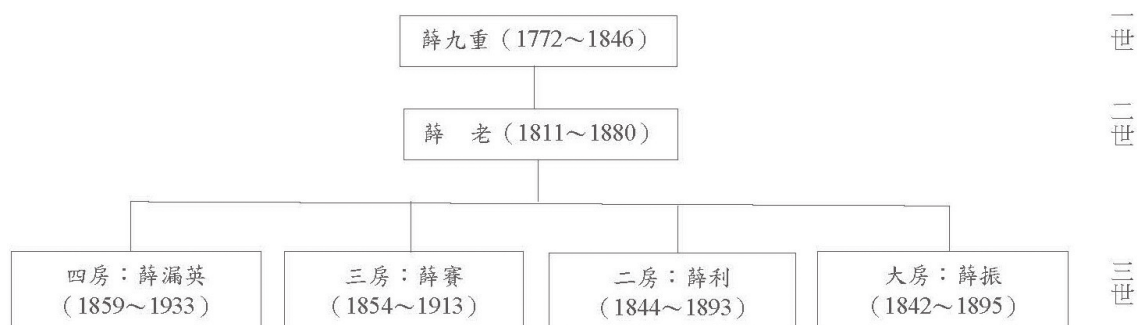


圖2 薛家左營廊後一世至三世祖譜

說明：感謝薛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薛永豐先生提供〈薛氏先祖出生、忌辰紀錄表〉（高雄：私家版〔未刊稿〕，1997），特此致謝。

圖片來源：依據薛氏文教基金會之祖譜（郭吉清，收於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巿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高雄：高雄巿政府文化局委託出版，2020〕，頁2-22～2-25）繪製而成，人物生卒年為筆者加註。

薛老育有四子，依序分別是薛振、薛利、薛賽及薛漏英。約在日治大正期該四房分家，手足合力經營家業，也分工各司其職。之後隨著大房薛振和二房薛利相繼過世，由三房薛賽當家主持，成為薛氏家族當時主要的代表人物。

薛賽曾任廊後第二保保正，職業農，執業登記為雜貨商，¹⁰在其帶領主導之下，薛家躍登左營四大家族行列，與陳、李、謝家齊名；¹¹又據日治初期流傳於左營及廊後地區的俗諺，「左營薛賽、內惟陳仔苔（陳乾）、高雄陳中和」並稱為高雄三大家族。¹²以薛賽為首的家族事業盛況和社經地位實力，由此可見一斑。

二、二房薛利之世系發展

二房薛利派下世代，人丁昌盛，枝繁葉茂，也是本研究主角薛國樑所屬的族系。薛利娶妻張定，育有薛占、薛旺、薛祥三子。¹³薛國樑出生之際，在當時家父長體制下，

¹⁰ 薛賽戶籍資料，家族提供；作者不詳，〈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1907），頁570。

¹¹ 林琇梅等撰稿，陳妙瓊、王華瑾執行編輯，〈史蹟高雄〉（高雄：高雄巿政府教育局，2006），頁67；陳子敬撰稿，顏嘉億等執行編輯，〈高雄文明史——史蹟篇〉（高雄：高雄巿政府教育局，2012），頁39。

¹² 郭吉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頁47；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巿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1-2、3-8。

¹³ 本文有關薛家二房族系史料，部分參考戶籍資料，以下若有引用，將不一一註釋，在此說明。

二房整個家族的經濟與財產管理大權，由長男薛占總攬，掌控著百餘人的生計。¹⁴

薛占（1876～1961），戶籍資料登記為雜貨商，教育程度為識字，日治時期曾任保正。薛占於 1895 年與林是（右昌人）結婚，生薛喜、薛車鬱、薛媽尚、薛有信四子；特別的是，祖譜上另也記載長女薛翹。薛喜（1897～1975）為薛國樑的父親，教育程度為國校畢業，職業原登記無業，戰後 1968 年變更為自耕農，並擔任廊北里第一屆里長，也是日治舊城信用組合戰後改組轉化為左營農會的會員代表。¹⁵

薛喜 1912 年 3 月舊城公學校（今舊城國小）畢業，與妹婿楊仲鯨（右昌人，1898～1967）、亦即薛占長女薛翹的先生同屆。¹⁶ 現舊城國小校園內有棵老榕樹，據傳為早期薛喜親手栽種，¹⁷ 目前依舊鬱鬱蒼蒼，傲然屹立，一直是該校精神指標之一。在 2000 年舊城國小慶祝創校百年前夕，還特別舉辦「寶貝老樹、百歲祈福」的暖壽活動，¹⁸ 當時擔任校友會會長的薛國樑也特地從日本返校參加。

薛喜有兩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李阿娒（桃子園人），兩人於 1916 年結婚。李阿娒過世一年多後，薛喜在 71 歲時的 1968 年，再娶第二任妻子顏秋琴（日文別名「春子」）。

薛喜與李阿娒育有 5 男 5 女，兒女成群，可謂「增產報國」的好榜樣，1942 年還獲得高雄市「優良多產多育模範家庭」的表揚。¹⁹ 10 位子女中，薛國樑為長男，其弟妹依序為薛國安、薛鴛鴦、薛國民、薛雪英、薛國治、薛國泉、薛美珠、薛麗珠、薛寶珠。左營著名的信仰中心鳳邑舊城城隍廟，在 1960 年代重建時，薛喜擔任修建委員會的常務委員，統籌會計事宜，²⁰ 同時也號召家族捐獻廟口龍柱與正面壁堵，長排的捐贈者列名在上，顯見薛喜家族子孫滿堂，香煙鼎盛（圖 3）。

14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6。

15 郭吉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頁 75；曾光正，〈左營歷史照片暨古文書〉，頁 69。

16 為舊城公學校第五屆畢業生，當年度畢業者僅有男生 8 名，參見王永志總編輯，〈舊城壹世紀：高雄市舊城國小一百週年校慶特刊〉（高雄：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2000），頁 216。

17 同上註，頁 17、18、34、63。

18 陳璧琳，〈父親在此手植榕樹 他的快樂童年在此度過：舊情綿綿 薛國樑飛回母校〉、陳璧琳，〈榕樹爺爺 90 歲 舊城國小獻壽蛋：小朋友賀卡與手繪彩色蛋掛滿枝桠 校園喜洋洋 也為百年校慶暖壽〉，兩則均見《中國時報》（1999 年 11 月 24 日），第 17 版。

19 〈生めよ殖せよの國策型 高雄市で表彰された子寶部隊〉，《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2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20 參考《南臺灣的守護與見證：左營舊城城隍廟》廟誌介紹的「廟史表」，以及正殿內壁飾上的「舊城城隍廟沿革」。



圖3 舊城城隍廟正面兩側壁堵捐獻者的薛喜家族

圖片來源：2024年11月20日筆者攝。

三、立家業

展鴻圖

薛家世居廊後，顧名思義，此地與早期製糖場所的「糖廊」密不可分。臺灣糖業的歷史可追溯至荷蘭時期，歷經鄭氏、清領乃至日治，南臺灣的製糖業依舊興盛。廊後位處旱田，適合種植不苛求灌溉水源的甘蔗，因此廊後聚落的形成，當與蔗田和糖廊息息相關，由此可推知薛家事業根基和製糖產業有深厚關連。

薛家除擁有廊後一帶的蔗田與糖廊外，也購置埤仔頭、凹仔底及覆頂金的新庄仔等地田產，據傳有超過百甲的土地從事種稻；同時設立「通興」與「順興」兩家商號，進行營業販售，由大房薛振及二房薛利負責經營。²¹總而言之，以米糖生產加工為基礎，加上商業經營買賣，讓清代薛家累積了相當的財富。

進入日治時期，薛家事業跨足其他產業領域，朝多角化經營，舉凡脫穀業、農產品收購、魚塭養殖、釀酒、鴉片、雜貨商店等，無不涉入參與。脫穀業大抵由大房薛振世系派下主導，而農產品收購則由三房薛賽世系派下辦理；此外，因薛家鄰近左營海邊的

21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2-41、3-8。

萬丹港，故也從事魚塭養殖和漁產販賣，二房薛利世系派下是主要經營者。²² 至於釀酒、鴉片及雜貨商店等事業，確切的史料付之闕如，只能憑族人敘述，略知梗概。

根據三房派下族人薛順回憶，薛家祖先刻苦成家，以務農為生，曾種過甘蔗、蕃薯、花生、稻米等農作，從事製糖和糧行生意，也經營魚塭及釀酒銷售。²³ 又，二房派下族人薛博仁（薛國樑長子）聽聞長輩表示，當四房分家後，上面的三位兄長聯手經營以農業為主體，以及百貨商店、脫穀業、製糖業和鴉片生產等關連事業；其中鴉片是臺灣總督府獎勵的換金作物，屬國策商品且是受配給的管制品，故薛家僅負責生產。²⁴

綜上所述，薛家自清領中後期發跡崛起，以農業生產加工和商業販賣的糖廊糧行經營為根基，嗣經日治時期逐步發達茁壯，營利觸角也延伸至各種行業領域，結合農漁商業加上擁有大片土地田產，可說是薛家成功致富的關鍵。

四、起家厝 代代興

從中國大陸移墾來臺的薛家，歷經清領至日治的流轉歲月與環境變遷中落地生根，興家立業，進而族系繁茂，開枝散葉，創造一段不凡的家族歷史，而最能彰顯薛家在左營立足昌盛的象徵，無庸置疑，就是「薛家古厝」（圖4）。²⁵

薛家古厝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廊北里海平路 40 號，是目前高雄港都保存最完整，也是碩果僅存的傳統民宅建築之一，現今為市定古蹟。²⁶ 古厝格局



圖 4 薛家古厝大門的第一進前落院埕

圖片來源：2023 年 2 月 11 日筆者攝。

22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3-8。

23 薛順受訪，〈高雄探索：三進院落的薛家古厝〉，《高雄畫刊》，4（4）（1983），頁 18。

24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48。

25 以下有關薛家古厝之考察，除有加註者外，其他主要參考前述（註 5）薛氏文教基金會早期部落格的文章。

26 〈指定「左營廊後薛家古厝」為市定古蹟。〉，高市府文資字第 10331198101 號（2014 年 8 月 11 日），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103：秋：16，頁 1-4。

屬典型的三進落合院雙護龍形制，為簡樸風格的閩南式民居，興建歷經三代祖先、跨越三個年代，逐次構築而成的大規模合院住宅群，建造時間縱深近達百年，空間占地廣約一千四百坪。

薛家古厝的三進院落，依起造年代推移，當第一進前落蓋好後若有新建，則按規格向後及左右發展，一進一落次第增加，惟整體建築形式融合不悖，有條不紊，逐漸建構成如今的面貌，與古時候富裕人家一次就完成大府宅第，意義上截然不同，充分展現薛氏祖先筚路藍縷、刻苦奮鬥的艱辛歷程，更是歷代家族心血凝聚的精神表徵。

回顧左營開基祖薛九重初到廊後投靠姑母薛屬時，只能以一間草屋竹舍遮風蔽雨，待經濟情況好轉後，才有能力興建第一進的前落，²⁷ 時間約在 1820 年。²⁸ 由於薛九重協助姑母薛屬夫家陳淵豹的事業，據聞當時陳家有意將自家的菜園地贈與薛九重建屋，然在其堅持下，最後薛九重以購買方式取得，並蓋起古厝的第一進前落。²⁹

第一進前落門額題「河東」，代表出身地原鄉或宗族祖籍流派的堂號，意即「來自河東的薛家」；³⁰ 公廳內匾額則書寫「克昌厥後」，寄寓「從今在此基業永存，子孫後代興旺發達」之意。³¹ 繼之，1850 年，薛九重之子薛老於第一進正後方新建第二進中落，門額題「梅魁」；據廖德宗、洪親慧研究團隊研判，第二進土地為陳家所贈與，因此薛老興建第二進中落時，基於當時社會約定習俗，乃避用薛家堂號而改採「梅魁」。³²

事隔六十年，於日治時期的 1910 年，薛家再新建第三進後落於第二進正後方，門額亦題「河東」，而主事起造人各有說法，可能是三房薛賽，或是其次男薛仙人與二房派下的薛占。³³ 第三進土地為自購買入，落厝之款式造型最昂貴也最繁複，顯示家族經

27 參見薛順受訪，〈高雄探索：三進院落的薛家古厝〉，頁 17，以及王瑞伶，〈老街老厝老故事：瞧，一座務農家族的古厝〉，《聯合報》（2000 年 4 月 12 日），第 39 版。

28 關於薛家古厝三進院落的建造年代有數家說法，例如：（1）薛順和薛永豐所言，推算分別約在 1800 年代、1830 年代及 1900 年代（同上註）；（2）又如薛氏文教基金會部落格記載，依序興建於 1819、1850、1910 年；（3）再如林世超研究團隊考證，推論第一進前落建於 1820 年或 1823 年，第二進中落和第三進後落則分別在 1850 及 1910 年興建（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1-17、2-41）；（4）另如楊玉姿研究，三進院落興建年代為 1820、1850 與 1910 年。本文以楊玉姿說法為依據，參閱楊玉姿，《高雄市史蹟賞析》（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9），頁 138 ~ 141。

29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3-7 ~ 3-8。

30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80。

31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3-77 ~ 3-78。

32 廖德宗、洪親慧，〈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頁 247 ~ 248。

33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2-41。

濟狀況日益茁壯好轉，雖距今已逾百年，但保留較多原貌。³⁴

除上述三進院落的主體建物外，為因應薛家人口不斷增加與家族成婚，從清領至日治時期，陸續於每落大厝及其外圍的左右，開始增建伸手與護龍，³⁵漸次構成今日三進院落帶左一右二雙護龍的龐大住宅群。薛家古厝深具文化資產價值，論者亦指出，薛家古厝的興築樓起，見證了薛氏家族崛起與成長的歷史，且和左營廊後聚落發展的黃金歲月重疊；而薛家在米糖貿易上的表現，與打狗高雄的產業開發更是息息相關。薛家古厝空間形塑的歷程，可說具體呼應了此段歷史之演變。³⁶薛家在左營的發展過程，也是南臺灣漢人家族藉由農漁商複合經營而壯大的代表性實例。

肆、戰前薛國樑的成長與求學歷程

一、就學左營與楠梓公學校

薛國樑 1917 年 9 月 21 日誕生於左營廊後的薛家古厝，為父親薛喜與母親李阿娣的長男，屬二房薛利派下世代。1924 年 4 月，薛國樑入學當地舊城的公學校（今舊城國小）³⁷。

薛國樑回憶在左營公學校的求學經驗提到，白天在教室接受日語教育，放學後會到校園角落的崇聖祠，以臺語學習《論語》等四書五經。對他而言，或許對漢語教育懷有憧憬，³⁸也是一段不同體驗的求知歷程，而接受古典儒家思想的洗禮，對其學識與人格

34 廖德宗、洪親慧，〈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頁 249；林琇梅等撰稿，陳妙瓊、王華瑾執行編輯，《史蹟高雄》，頁 67；陳子敬撰稿，顏嘉億等執行編輯，《高雄文明史——史蹟篇》，頁 39；楊玉姿，《高雄市史蹟賞析》，頁 139。

35 譬如：大房薛振與二房薛利，於清領時期新建前落及中落的左護龍；日治時期 1924 年，二房派下的薛占增建後落的左右護龍；昭和年間，四房薛漏英派下的族人興建前落右護龍；1936 年，二房派下的薛占與薛旺新建右外護龍。即使到戰後，各房派下也持續新增及整修建伸手、護龍與落厝等。

36 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1-5、6-1、6-6 ~ 6-7。

37 「舊城公學校」創建於 1900 年 2 月，當時利用蓮池潭畔的文廟崇聖祠作為教室上課，爾後校名數度更迭，薛國樑入學時的校名是「左營第一公學校」，而畢業年度則為「左營公學校」。有關該公學校之校史演變，參考徐輝閔，〈日治時期舊城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36 ~ 44；王永志總編輯，《舊城壹世紀：高雄市舊城國小一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183 ~ 186。

38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43 ~ 44。

的基礎養成，必有一定的影響。筆者認為，薛國樑此時難忘的學習經歷，這可能也是戰後他將子女送進日本的東京中華學校就讀，並持續捐助華僑學校的遠因。

薛國樑左營公學校畢業後，和想再多讀點書的部分臺灣人子弟一樣，選擇就讀附設在公學校的二年制高等科，算是初等教育本科的延伸學習。因左營公學校當時未設有高等科，³⁹ 因此薛國樑自 1930 年 3 月畢業後，4 月就近至楠梓公學校（今楠梓國小）的高等科入學，在 1932 年 3 月畢業，完成初等教育，屬於該公學校高等科的第八屆學生。⁴⁰

雖然薛國樑於戰前楠梓公學校高等科僅僅在學兩年，但其在日本僑界的傑出表現有目共睹，2000 年楠梓國小慶祝百週年校慶，他榮登該校「校友在社會有成就人士錄」實業界巨子的芳名錄中，顯見對薛國樑備極推崇與愛戴。⁴¹

二、舊城信用組合就業

完成初等教育的薛國樑，接著挑戰中學校的升學考試卻不幸落榜，斷了升學之路的他，只好進入社會就業謀生。恰巧母親李阿娣的兄長李新春當時在舊城信用組合服務，⁴² 於是在該位舅舅的引薦下，1932 年 4 月入社就職，時值薛國樑 14 歲多，成為社會新鮮人，展開人生新階段的職涯旅程。⁴³

薛國樑最初在舊城信用組合受僱為基層勤雜工的「給仕」，由於擅長算盤，之後被提拔到會計部門。隨著 1919 年左營大路開通，繁華新商圈逐漸形成，業務不斷成長的舊城信用組合於是在 1934 年底，從原先的店仔頂路搬遷到左營大路今農會現址並興建新廈，薛國樑也跟著轉換到新辦公大樓上班。

39 左營公學校直至 1942 年 4 月始設置高等科，而當時校名已改為「左營東國民學校」，參見徐輝閔，〈日治時期舊城公學校之研究〉，頁 43 ~ 44、132。

40 楠梓公學校與舊城（左營）公學校校史同樣悠久，也是創立於 1900 年 2 月，而薛國樑列名在楠梓公學校高等科光復前第八屆畢業生名冊中，參閱朱政光總編輯，〈楠樹百年 梓耀千禧：高雄市楠梓國小壹百週年校慶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2000），頁 61 ~ 62、240。

41 同上註，頁 192。

42 舊城信用組合設立於 1920 年 3 月 25 日，戰後改組轉型為高雄市農會左營區農會，2012 年 6 月更名為今日的「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左營辦事處」。參見「有限責任舊城信用組合設立」（1920 年 3 月 1 日），〈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十六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064001。另外，〈信用組合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43 以下有關薛國樑在舊城信用組合工作情形，參閱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7 ~ 8。

薛國樑曾在任職期間的 1935 年，代表舊城信用組合，參加由臺灣產業組合協會岡山分會所舉辦的實務競技賽會，在激烈角逐中脫穎而出，分別於第一部（競技科目：借貸對照表、損益計算書、資產負債法規等）及第二部（競技科目：概算與傳票等），勇奪一等賞和三等賞，⁴⁴ 表現相當亮眼。由此得知，薛國樑對數字頗具敏感度，專精數算，此時段的職場歷練，無疑地為他往後的商業經營與投資管理奠定良好基礎。

三、勇闖滿洲

有穩定工作，過著上班族規律生活的薛國樑，沒想到有天讓他擴展視野的機會降臨身上，也從此走向新奇且長遠的海外旅程。母親李阿娣的弟弟李清漂，也是前述舊城信用組合要員李新春的弟弟，他在中國東北的滿洲國奉天（今遼寧省瀋陽市）開設「日新鐵工廠」，薛國樑約於 1937 年左右前往滿洲，進入舅舅李清漂的鐵工廠工作。⁴⁵

原本滿懷期待，夢想可在「王道樂土」的滿洲大展抱負，不料真正到當地，卻是只做低階職工的工作，事與願違。薛國樑在惡劣職場環境中似乎顯得坐困愁城，後來想到出發前往滿洲之際，左營公學校恩師大貫輝雄提起他的弟弟大貫大八在滿洲任職，⁴⁶ 若遇到困難可以去找他，薛國樑遂登門拜訪，結果大貫大八力勸他不要在這裡工作，並鼓勵薛國樑去日本讀書。

大貫大八的一席話，讓薛國樑驚覺體認到繼續求學的重要性，於是決定結束在滿洲的職工生活，轉往日本留學。由此可知，大貫大八可說是改變薛國樑人生進路重要的關鍵人物，帶給他深刻且長遠的影響；而兩人後來成為莫逆之交，情誼維繫甚至持續到戰後。

44 〈岡山郡產組 實務競技〉，《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夕刊（1935 年 10 月 23 日），第 4 版。

45 關於薛國樑的滿洲經驗，參考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8～9。另外，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4 年 10 月 17 日，未刊稿。

46 大貫大八（1903～1971），日本栃木縣出生，1927 年中央大學專門部法科畢業，1928 年成為律師，1937 年前往滿洲國任官，歷任東安省事務官、樺川縣事務官、湯原縣副縣長及樺川縣副縣長等職；戰後 1958 年 5 月，由社會黨提名當選第 28 回眾議院議員。參閱〈滿洲篇〉，收於帝國秘密探偵社編，《大眾人事錄 第 14 版 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3），頁 61；笛木隆，〈大貫大八〉，收於栃木県歴史人物事典編纂委員會編集，《栃木県歴史人物事典》（栃木：下野新聞社，1995），頁 136；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新訂 政治家人名事典 明治～昭和》（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2003），頁 117 等。

四、赴日留學

推測在 1938 年間，薛國樑轉往殖民地母國的日本內地留學，當時已屆弱冠之年的他邁入人生另一階段，重拾書本當起學生，自立苦學。此時的薛國樑先後就讀東京主計商業學校、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以及中央大學法學部，⁴⁷ 完成中高等教育。

（一）東京主計商業學校

東京主計商業學校肇建甚早，1883 年 9 月在東京創校，初期校名為「簿記法教授所」，可說是日本私塾性質之簿記教育的開山鼻祖。⁴⁸ 簿記法教授所爾後校名屢有更迭且遷校多處，薛國樑當時入學時的校名為「東京主計商業學校」。⁴⁹

事實上，這所學校自創立伊始，即順應日本教育政策及產業脈動變遷，學制與學科別相當多元，各科入學資格和修業年限規定也不斷更替，頗具彈性，以契合產業發展需求；加上辦學績效逐漸受到矚目，且對部分科別畢業生，政府認可授予會計士、監查士、計理士等資格稱號，⁵⁰ 故吸引眾多學子報考就讀。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該校一直獲得田口卯吉、中村正直等多位政商名流與社會賢達的大力贊助，擁有雄厚的社經人脈關係，構成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尤其校友遍布相關業界領域，人才輩出，「主計幫」儼然成形，對提攜後進安排就業，發揮不少影響力。⁵¹ 總之，入學寬鬆、學制多元，而且辦學績優與校譽卓著，以及「主計幫」名聲響亮等，這些可能都是薛國樑選擇就讀該校的主因。

雖然缺乏確切史料瞭解薛國樑係入學哪一學科，但標榜培育商店、銀行、會社公司及官廳等會計事務和簿記計算專業人才的東京主計商業學校，薛國樑在此受教學習，可

47 參考楊文魁編纂，《日本華僑紳士錄》（初版），頁 86；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70；鍾清漢，〈華僑評伝（11）華僑の誇りに生きた薛國樑会長の生涯〉，《アジア文化》，24（2000），頁 166。

48 〈各種学校台帳（商業）〉：文部省實業學務局列冊資料，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主計學園編纂，《主計學園五十年志》（東京：主計學園，1933），頁 1。

49 主計學園編纂，《主計學園五十年志》，頁 2～6；「東京主計學校名稱變更（文部省告示第 42 號）」（1934 年 2 月 16 日），《官報第 2136 號》，大藏省印刷局（東京），頁 432。

50 主計學園編纂，《主計學園五十年志》，頁 14、24。

51 參見立志成功研究會編，《實行容易無資本小資本實業成功法》（東京：安藤書店，1915），頁 94～95；首藤佐七（司誠），《小學卒業後の立志成功寶典》（東京：司誠堂代理部，1916），頁 34～36。

說承襲了過去舊城信用組合的在職經驗，不僅深化其學理與實務知能，也為日後經商從商做足準備，無庸諱言，入學該校不失為最恰當的升學途徑，對薛國樑往後在日本經營事業，亦是助益頗大。

（二）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

薛國樑從東京主計商業學校畢業後，於 1940 年 4 月至 1942 年 9 月就讀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基本上，戰前日本舊學制的專門學校或大學專門部，其修業年限為三年（醫學科例外）。然而在二戰期間，為因應戰時局勢，亟需快速量產勞動力，於是自 1941 年起，逐步採取縮短修業年限的非常措施。⁵²

因此，1940 年 4 月入學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的薛國樑，本應於 1943 年 3 月畢業，卻因受制縮短六個月修業年限之政策，提早於 1942 年 9 月畢業，在校只念了兩年半就結束了專門部的學業，隨即在 1942 年 10 月，升學進入中央大學法學部。

（三）中央大學法學部

薛國樑於 1942 年至 1944 年，就讀中央大學法學部。根據該校資料館記載，薛國樑該屆是在 1942 年 10 月 6 日舉行學部入學儀式，1944 年 6 月 10 日至 16 日實施畢業考試，而在事隔三個月後的 9 月 22 日才舉辦第六十屆畢業典禮，其中法學部共有 494 位畢業生。⁵³

實際上，處於戰時體制下的高等教育機關，校務幾乎難以正常運作，教學也陷入十分不穩定的狀態，當年許多大學應屆畢業生，在正式畢業前夕大抵已就業工作，薛國樑亦不例外。⁵⁴ 不啻如此，上述的縮短修業年限，以及 1943 年實施的取消大學在校生兵役緩徵之政策，多少也衝擊到薛國樑在中央大學的求學歷程。就前者而言，原本大學修業年限規定為三年，此時被迫縮短成二年，因此薛國樑提前在 1944 年 9 月畢業。

至於後者取消兵役緩徵方面，1943 年 10 月日本政府發布取消高等教育機關在學生

52 西山伸，〈戰時期における高等教育機関の在学・修業年限短縮について〉，《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15（2017），頁 19～32。補充說明：縮短修業年限措施，同樣在當時的殖民地臺灣實施。

53 中央大學官方網站，〈中央大学年表〉（1942 年及 1944 年條述）。資料檢索日期：2025 年 3 月 28 日。網址：<https://reurl.cc/5KGKxM>。

54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10。

兵役延緩徵召之規定，除理工醫與教員養成學科之學生外，其他人均須被軍事動員，即所謂的「學徒出陣」，菁英學子被迫趕赴戰場。⁵⁵ 中央大學早在 1943 年 10 月 8 日就舉行「出陣學徒壯行會」，送走第一批即將入營的在學生，⁵⁶ 而當時也邁入 26 歲的薛國樑，其在學期間未被徵集入伍，算是相當幸運。

薛國樑向來以出身中央大學為傲，姓名不僅列入該校出版的學員名簿中，嗣後他也出任中央大學華友會副會長。⁵⁷ 戰後薛國樑在日本創業成立貿易公司，在擔任社長時代，他的辦公桌上必擺放一本《白門紳士錄》，⁵⁸ 除自豪擁有中央大學學歷外，這本集結傑出校友出版之紳士錄，收錄涵蓋林以文等旅日僑領，⁵⁹ 以及活躍於日本政商法曹各界名流，足以彰顯他們皆是出自白門學閥的菁英階層。

五、入社工作

薛國樑在中央大學正式畢業前夕，與多數應屆畢業生一樣，均已投入社會工作。不過，在學期間好不容易逃過「學徒出陣」的薛國樑，如今甫就業又得面臨殖民地出身者也要被徵調服役的危機，因此他開始探詢能否在軍需工廠就職的門路。恰巧在滿洲的舅舅李清漂有位同窗好友，其父親是海軍中將村田豐太郎，乃透過這層關係管道，請託安排謀職機會，於是在村田中將的介紹下，薛國樑進入海軍御用公司「高安合資會社」位在東京的營業所任職，⁶⁰ 這也是他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

薛國樑入社時受到高安良雄社長的關照，是薛國樑口中常提起的恩人。當年薛國樑受僱辦理事務職，專責總務與原價成本計算方面之業務，可說相當契合年少時在舊城信用組合的歷練，以及之後在東京主計商業學校的專業學習，這些經驗讓他得以施展長才。

隨著戰況吃緊，日本戰敗氣氛逐漸濃厚，東京的高安社員被迫疏散至岐阜縣的本

55 西山伸，〈1939 年の兵役法改正をめぐって——「学徒出陣」への第一の画期として——〉，《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13（2015），頁 43～54。

56 中央大學官方網站，〈中央大学年表〉（1943 年及 1944 年條述）。網址：<https://reurl.cc/5KGKxM>。

57 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學員名簿〉（東京：中央大学學員課，1956），頁 446；楊文魁編纂，〈日本華僑紳士錄〉（初版），頁 86。

58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9。此外，中央大學在日本教育界另有「白門」之稱號，似有對抗東京大學「赤門」，以及早稻田大學校友會「稻門會」的意味。

59 白門紳士錄刊行會編集，〈白門紳士錄〉（東京：白門紳士錄刊行會，1976），「林以文」載於頁 67。

60 以下有關薛國樑在高安合資會社工作，以及戰時疏散至岐阜縣躲空襲和迎接終戰初期之情形，主要參考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10～16。

社，1945 年 5 月薛國樑轉調工作地點，也舉家搬遷到該處居住。是年 7 月初，薛國樑預見空襲可能將近，於是決定為家產投保戰爭險；不久，果真在 7 月 9 日晚上岐阜遭受美軍猛烈空襲，市中心引發大火，住家也因此受到波及而燒毀殆盡。

空襲後，僥倖存活的薛家人被安置住在破敗的員工宿舍客廳，隔天 7 月 10 日，因工廠已難以繼續運作而停工，薛國樑遂立刻去提領戰爭保險金，共有 2.5 萬日圓，據聞才領取沒多久便傳來保險金理賠支付停止受理的消息，眾人都說薛國樑擅於抓住時機，非常幸運。

人生第一桶鉅額的金錢入袋，薛國樑馬上就想到盡孝道，他將其中的 1 萬日圓立即匯款給在臺灣左營的父親薛喜，大幅改善家中經濟狀況，這件事一直是他引以為傲的事親話題。⁶¹一個月後的 8 月 15 日，薛國樑外出購物，那天恰好是天皇發布終戰詔書「玉音放送」的廣播日，薛國樑完全不知此事，只見到很多人在收音機前哭泣，覺得非常訝異，等回到家後才知道戰爭結束，不由得高喊萬歲。

戰敗的日本百廢待舉，這時薛國樑也無法再到高安公司上班，不得已只好向高安社長拜託，允許讓妻小暫時繼續借住於員工宿舍的客廳，薛國樑則在 1945 年 9 月獨自前往東京，直到 12 月底除夕前才返回岐阜，攜帶家眷移住東京。東京的新住所同樣獲得高安社長的協助，是高安公司在東京的出張所「高安寮」，位在荻窪的天沼。薛家人在此居住了大概一年，直到薛國樑在目黑區月光町購屋後才搬離，同時也展開戰後在日本的事業。由此可知，高安社長不僅在戰爭期間，甚至在戰後生活等各方面，給予薛國樑家族相當多的幫助與照顧，可說是薛國樑生命中的大貴人。

伍、戰後的經貿活動與政商網絡

一、夾縫中的生財之道

由於戰時美軍的大轟炸，敗戰後的東京宛如廢墟，且物資相當匱乏，因此 1945

⁶¹ 薛國樑曾說，終戰前的基本月薪約為 200 日圓，所以 2.5 萬日圓是相當大筆的金錢，當年他將其中的 1 萬日圓匯款給臺灣左營的父親，剩下的 1.5 萬日圓則作為戰後展開事業的資金，詳見薛國樑，〈東京中華学校について〉，2000 年 4 月 24 日演講稿，收於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14 ~ 15、67。

年底薛國樑從岐阜到東京後，很快就投入商品買賣活動。一般認為，戰後在日臺灣人為肆應時局，會投入黑市交易，主要就是利用戰勝國民的身分，到美軍福利社（Post Exchange，簡稱 PX）購買菸酒、米糧轉賣獲利，這是當時黑市買賣的生財模式。

根據薛國樑長子薛博仁的記述，有一天薛國樑來到美軍駐地旁，看見一群日本人靠近鐵絲網邊，圍著進駐的美軍一陣騷動，細問之下才知道是換取香菸，然後拿到黑市販賣。他馬上發覺這是很好的商機，從此也展開香菸的買賣。⁶²除了香菸之外，黑市買賣的商品主要是需透過配給才能取得的糧食，以及遭到管制的各種日用雜貨。盟軍占領下的日本，很多在日臺灣人跟薛國樑一樣，藉由黑市買賣來謀生，進而累積一定的資產。

許多名人發跡會有傳奇故事，薛國樑也不例外。據說有天他從友人得知，在「銀座和光」的巷弄裡，有一位猶太人在經銷砂糖，他立即前往該事務所，經交涉後取得分銷砂糖權益的承諾。在那混亂的時代，這樣的交易必須繳交保證金（前金），承擔著一定的風險，並非每個人都敢出手這項交易。薛國樑鼓足勇氣匯集資金，終於確保一批砂糖的承購權利。

等到砂糖運抵港口那天，薛國樑僱用了8輛卡車前往載貨，搬貨就如同搶東西，必須迅速將砂糖搬上卡車，然後運到上野「アメ横」銷售。當貨品運到之後，他詳細清點才發現多搬了一卡車量的砂糖，薛國樑立刻將多出的砂糖運回去。猶太商人對他誠實的态度甚感驚訝，因此兩人就約定「以後每次交易，首部卡車的貨品就交給你」。在那個年代，大家都競相將整車砂糖運到「アメ横」販售，最早到達的卡車貨品，可以比後到者高兩倍的價格售出。與猶太商人信守承諾而賺大錢，是薛國樑發跡的原因之一，這也是他經常引以為傲的故事。⁶³

戰後不久，薛國樑即加入華僑相關組織，根據1949年底出版的《東京華僑聯合會會員名簿》，薛國樑擔任聯合會執行委員，會長是林以文。依該名簿刊載，薛國樑出任「同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務董事，推測這家同德貿易應是黑市買賣期間臺灣人成立的公司。⁶⁴薛國樑在公司內的角色定位不詳，公司的後續發展也難以掌握，但從這本華僑名錄及其廣告頁所呈現的人脈關係和公司職位來看，此時的薛國樑已成為東京華僑

62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17～18。

63 同上註。

64 東京華僑聯合會，《東京華僑聯合會會員名簿》（東京：東京華僑聯合會，1949），目次前發刊辭照片及頁89；另，薛國樑當時亦就任中華料理「山水樓」的常務董事，頁221廣告。

商界團體的核心要員。

薛國樑從事黑市買賣，到底持續多久、獲利如何，如今已不可考，然而戰後日本黑市交易的榮景，大概到了 1948 年秋天就進入尾聲，因為這時主食的配給穩定下來，都市與地方交通全面恢復，各類蔬菜、魚類等食品，以及酒類、日用品的管制也解除；1950 年以降，砂糖、小麥粉等都可以自由買賣，進入自由經濟之後，黑市也就自然消失。⁶⁵

二、擴展商貿事業版圖

戰後從商發跡的薛國樑係以黑市交易起家，而後逐步擴大其事業版圖。1949 年 4 月，臺灣香蕉開始恢復輸入日本市場，1950 年 9 月臺日簽署貿易協定，雙方重啟經濟關係，此時薛國樑開始籌設貿易公司，⁶⁶ 其商業活動也從黑市交易轉為經營臺日兩地的進出口貿易。

首先，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前一年的 1951 年 2 月，薛國樑沿用清代薛家祖業「順興」的商號，在臺灣申請設立「順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3 月奉准許可並取得公司執照，公司位在高雄市廊後，負責人是薛國樑的父親薛喜，但是在日本出版的人事錄，薛國樑職稱為董事長。⁶⁷ 隔年 1952 年 8 月，順興貿易公司聲請變更登記，選任薛喜為總經理，並於 9 月遷移公司至高雄市左營大路；繼之於 1953 年 5 月，公司選任薛國樑兩位弟弟薛國治為經理、薛國泉為副經理，由薛國樑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申請登記，嗣後轉請經濟部鑒核於 6 月獲得核准。

其次，臺灣的順興貿易公司成立後，薛國樑同時也設立東京支店。1954 年 5 月，東京支店在日本改登錄為「順興貿易株式會社」，依 1957 年的資料記載，會社地址登記在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の內的「丸ビル（丸大樓）」，專營青果物、纖維、藥品等進出口，

65 稻葉佳子、青池憲司著，黃耀進譯，《臺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臺北：凌宇，2020），頁 60～72。

66 以下參考〈薛國樑生平年表〉（未刊稿）。

67 帝国秘密探偵社編，《大衆人事錄 第 16 版 全国篇》（東京：帝国秘密探偵社，1953），頁 567。在日本以「順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東京支店型態營業，公司地址登錄在東京都目黒區月光町。

而公司的代表為薛國樑，股東包括林以文、林益謙、高安良雄等。⁶⁸ 接著 1957 年 5 月，順興貿易改名為「順興商事株式會社」，1959 年 9 月再更名為「富國物產株式會社」。⁶⁹

戰後的 1950 年代，是薛國樑經商致富的關鍵時代，最初買賣的商品為砂糖與香蕉，原本是以臺灣公司東京支店的模式經營貿易，1954 年正式登錄為日本公司後，公司名稱及登錄之變更，代表其營商成功並累積一定的財富。從黑市買賣到在日設立貿易公司，顯示薛國樑卓越的經商手腕，他全力投注臺日之間的進出口貿易，業務蒸蒸日上，也迅速累積可觀的財富。

其中，香蕉貿易是奠定薛國樑初期經濟基礎的重要事業。據說，薛國樑最早是以築地的華僑大樓為據點，展開香蕉進口貿易，當時日本政府針對輸入臺灣香蕉採抽籤方式進行分配，⁷⁰ 許多人也因中籤而一夕致富。薛國樑很幸運連續三年都抽中進口配額，而九州各地的業者連一支籤也沒抽中，只能向中籤的薛國樑再三請託，才得以獲得進口配額。雙方都很珍惜這樣配額轉讓的情誼，因此薛國樑與「九州臺果株式會社」的交易持續長達約三十年之久。⁷¹

根據劉淑靚的研究，戰後臺日香蕉貿易依然存在著「家族共營、親族相幫」的傳統商業特色，有的蕉商本身就具備臺灣蕉商與在日華商的雙重角色，甚至臺灣蕉商在日設置公司聯號或與在日華商建立合作網絡。⁷² 以薛國樑為例，臺灣的順興貿易公司主要由弟弟薛國治負責出口業務，然後將香蕉等貨品輸出到公司的東京支店、亦即日後改名的順興（富國）株式會社，而日本方面則由薛國樑統籌進口與販售；臺日兩地建立對接窗口，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商業聯號的經營模式。

隨著蕉貿景況日益蓬勃發展，薛國樑在臺蕉進出口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不僅加入以在日華商為主體的「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同時也參與由日商華商聯手投資的香蕉

68 帝國興信所編，《帝國銀行・会社要録第 38 版》（東京：帝國興信所，1957），頁 295。另外，此處列名股東的高安良雄，就是前述戰前高安合資會社（戰後為高安株式會社）的社長，薛國樑為感念高安社長在戰前的栽培與關照，故在日本創業成立公司時，即邀請高安良雄入股。

69 交詢社出版局編，《日本会社録 第 3 版》（東京：交詢社出版局，1963），頁 154。按社史紀錄：1954 年 5 月 21 日「順興貿易株式會社」創立；1957 年 5 月改名「順興商事株式會社」；1959 年 9 月更名「富國物產株式會社」，若再加上公司在臺前史，則要從 1951 年 2 月 5 日申請設立「順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算起。此外，根據薛博仁的說明，父親擁有株式會社百分之百的股份，當初為登記公司之需，其他股東都是借名，參考薛博仁提供 1970 年代的公司資料。

70 日本政府為管理臺灣香蕉進口配額，順應實際現況演變採行多項措施，而自 1950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 月是實施所謂的「抽籤制」，參閱河野孝行，《バナナの国・台湾》（兵庫：食品市場新聞社，1966），頁 78 ~ 80。

71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26。

72 劉淑靚，《臺日蕉貿網絡與臺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臺北：稻鄉，2001），頁 91 ~ 101。

加工產業。譬如：「東京バナナ株式會社」於 1963 年 2 月成立，以專營香蕉加工為業，薛國樑擔任監事；另外，同年 6 月設立的「國際バナナ株式會社」，薛國樑則為大股東之一。⁷³

值得關注的是，除香蕉貿易之外，1950 年代末期起，薛國樑也開始涉足「宅地造成」的不動產事業。富國物產時代，薛國樑到處覓地購買，並進行類似「社區造鎮」的開發事業。其經營模式為首先收購大片面積的土地，然後闢土整地進行區域重劃，同時開闢道路、完成上下水道與排水等設施之後，以住宅興建用地分售賣出。富國物產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業績頗為搶眼，成為中等規模的不動產會社。⁷⁴

依富國物產公司之資料顯示，不到二十年間土地開發事業由盛而衰。由於 1973 年遭逢石油危機，薛國樑又生了一場大病，公司營運受到很大的打擊，不動產事業遂停頓下來。這期間土地開發獲取的利益，以神奈川縣相模大野的土地開發案為例，養地二十五年後賣出，最高獲利達百倍，相當可觀。⁷⁵

在投入住宅土地開發時期，富國物產也同時加入社團法人「日本宅地造成協會」。1960 年 5 月該協會創立，薛國樑擔任監事，當時在日臺籍華僑擔任理事有林以文、李合珠、林以德等。事實上，以上這幾位華僑也經常共同出現在僑界公司的股東名簿中，相互間在事業上都曾合夥，但也發生過衝突。嗣後，1963 年 12 月由協會會員出資，再設立「日本宅地造成協會事業團株式會社」作為協會的事業部，薛國樑則擔任監查役。⁷⁶

另外，1970 年代薛國樑投入柏青哥之類的娛樂事業，並設立遊戲中心。此外，他也在銀座開設名為「クラブ黒ばら」的俱樂部，營業之餘也兼作接待商場貴賓的場所。這家俱樂部曾被媒體介紹，也出現在黑岩重吾的小說中；1980 年代初，俱樂部結束營業關門，但其他柏青哥等娛樂業的投資經營，則依然持續。⁷⁷ 商場上的成功，讓薛國樑成為國民黨政府必須拉攏的重要僑領之一。

73 〈薛國樑生平年表〉（未刊稿）。

74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29 ~ 31。

75 同上註，頁 30 ~ 32。

76 〈薛國樑生平年表〉（未刊稿）。

77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34 ~ 37。

三、日本華僑回臺投資

戰後，以華僑身分旅居日本的薛國樑，不僅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同時也加入中國國民黨，自始至終其政治立場從未改變。被視為國民黨政府派的薛國樑，在日本站穩腳跟後，即響應臺灣政府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的國策，約莫於 1950 年代就開始回臺投資生產事業。對華僑而言，歸國投資一方面是展現對政府的支持與認同，具有表態輸誠的政治意涵；另一方面，透過政府鋪設既可取得利益又能施展抱負的投資管道，藉此開拓獲利發展的新途徑，可說兼具經濟效益的雙重意義。⁷⁸

1950 年代臺灣正值進口替代時期，配合政府積極發展民生工業，薛國樑於 1956 年投入紡織業，回臺籌設「全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並在臺北縣五股鄉德音村成立人造棉紡織廠。該僑資案於 1956 年 4 月 12 日的第十五次「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以下簡稱投審會）決議准予投資，⁷⁹ 同年 9 月 3 日舉行廠房破土典禮，⁸⁰ 隔年 1957 年 11 月正式開工生產。⁸¹ 然而遺憾的是，囿於種種現實因素，大概在 1959 年 10 月、11 月之際，薛國樑結束全華公司的經營，並將公司與工廠悉數轉售給臺灣工商界鉅子陳查某的榮隆紡織公司。⁸²

其次，1960 年代臺灣轉型邁入勞力密集型態的出口擴張時期，以水泥為主的非金屬礦產開發成為拓展外銷重要事業之一，其黃金歲月甚且持續至 1970 年代以降。⁸³ 薛國樑亦於此時投資水泥產業，結合臺商共同集資，在左營半屏山麓創設「正泰水泥廠公司」。

再者，1970 年代遭逢石油危機和外交頓挫，臺灣經濟轉進以擴大內需為重點政策的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因應十大建設之推動，水泥業的僑資依然旺盛，而房地產建築業也正逐步勃興，薛國樑抓準商機，將他在日本實行的宅地營造開發經驗移植至臺灣，在

78 參見向誠主編、僑務委員會編印，《僑務五十年》（臺北：僑務委員會，1982），頁 206；徐珮瑛，〈僑資會與臺灣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僑資會訊》為中心的探討〉，《洄瀾春秋》，17（2022），頁 16。

79 〈華僑投資 昨准兩起〉，《聯合報》（1956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另參考僑務委員會，「據旅日僑商薛國樑呈為來臺投資設立全華實業公司請增加建廠預算并准輸入出售物資函請 查照核辦由」，〈投資協助〉（1957 年 9 月 10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046/003160/51/0001/010。

80 〈全華實業公司 廠房開始興建〉，《徵信新聞》（1956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81 〈全華紡織廠 下月開工生產〉，《聯合報》（1957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82 參閱僑務委員會，「前准投資設立全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撤銷希知照」，〈投資協助〉（1959 年 12 月 16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048/003160/52/0001/024。另，〈從尼龍到奧龍 再進到帝特龍，混紡辦法互有不同 技術成品日新又新〉，《聯合報》（1961 年 10 月 30 日），第 5 版。

83 僑務委員會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我國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檢討與改進方向》（臺北：臺灣經濟研究院，1993），頁 9。

1970 年代中期與臺灣建商合作，投資興建位於高雄市的公寓住宅。

綜觀上述有關薛國樑重要且較大型的華僑回國投資案，大多集中在高雄市，顯見他相當熱愛鄉土，也是貢獻故里的具體表現。但是，華僑回國投資並非穩賺不賠，其經營過程潛藏諸多風險。其中，正泰水泥廠公司及興建公寓住宅兩案例，以下根據目前得以掌握之文獻史料，分項考察探究。

（一）正泰水泥廠公司

薛國樑在 1960 年代因應臺灣產業趨勢和政府國策，進軍水泥業的在臺投資。實際上，薛國樑早在 1957 年即著手規劃，與上述全華公司紡織廠後期的營運時間是重疊的。1957 年 12 月 21 日，薛國樑提出「華僑回國投資申請書」，其事業名稱為「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⁸⁴

在申請書隨附的投資事業計畫書中，薛國樑詳述其投資動機、事業內容和做法。他提到，1957 年春天回國料理業務，並順道返回故鄉左營省親，蒙鄉梓父老倍賜關懷，且敦勵他需為鄉里福祉著想，應設法也在家鄉投資，創設與鄉梓有益的事業，令他感奮萬千。薛國樑進一步表示，1956 年回臺投資全華公司紡織廠，由於考量業務及氣候等因素，紡織事業設廠在臺灣北部較適宜，故未克在故鄉設立；如今承鄉里親友敦促，於是著手蒐集資料，調查切實可在家鄉設廠的事業。

恰巧友人彭畊集資創立正泰水泥廠籌備處，規劃擬在左營半屏山麓建廠採礦，且已獲得經濟部許可，加上因採礦區係屬國防軍事要地，由高雄要塞司令部管轄，此刻亦奉國防部核准，業與高雄要塞司令部訂妥租用合約書，彭畊乃邀薛國樑加入經營團隊，並按《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規定，以僑資案提出申請。

事實上，薛國樑和彭畊雙方於 1957 年 9 月 20 日就簽署共同投資合約，內容除載明雙方出資費用及預算外，另也約定在公司利益分配方面，特列需對工廠所在地區，提撥百分之三的教育或公益事業補助金，以回饋鄉里。由此可知，薛國樑對當時彭畊籌劃的正泰水泥廠事業，不僅頗表贊同而願意加入，也十分符合他想為家鄉奉獻的心願，既是

⁸⁴ 以下主要參考第六十七次投審會會議紀錄及附件資料。外交部，〈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1958 年 8 月 14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6/430.4/90。

回臺更是返鄉投資，況且建廠的前置作業幾近完成就緒，只是改由薛國樑主導，並以華僑回國投資名義申請設廠。

時序進入 1958 年，該僑資申請案遲遲未獲任何音信，薛國樑遂多次致函投審會等相關主管單位，好不容易等到 8 月 14 日的第六十七次投審會才排上議程，不過遺憾的是，正泰水泥投資案並沒有獲准通過，其理由為：本案計畫係設立小型水泥工廠，其生產成本較高，今後本省水泥已生產過剩，轉知投資人慎重考慮，以免投資後招受損失。⁸⁵

薛國樑對於這項審議結果依舊不死心，旋即向經濟部提出申復據理力爭，並表明投資的決心。嗣後，正泰水泥公司的投資申復案，在 1958 年 9 月 17 日的第六十九次投審會再被提上議程審議，最終決議准予投資。⁸⁶至此，薛國樑返鄉投資的正泰水泥廠公司確定核准通過，算是對左營父老的期盼有了圓滿的回應，對薛國樑而言，能為故里貢獻己力，自是無比的榮耀與欣喜。

正泰水泥廠公司從原先由民間人士籌劃的一般企業，搖身一變成為薛國樑主持的僑資事業，未來發展，指日可待。獲准投資後，千頭萬緒的建廠工作及業務推動陸續展開，而公司正式核准設立登記則是在 1961 年 2 月 28 日。⁸⁷同年 11 月媒體報導水泥廠業已開工生產，⁸⁸可說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然而公司的經營狀況跌宕起伏，興衰交替，而薛國樑此時是否還是正泰水泥公司的主要代表者，該公司是否仍屬僑資事業，無法確知。依目前可掌握的檔案史料及媒體資訊，不僅未出現薛國樑的名字或相關紀錄，而且當時大致都以一般民間企業看待處理正泰水泥，並未明指是僑資事業，故筆者推斷薛國樑大概在 1960 年代初期，可能已經退出了公司的經營團隊。⁸⁹

85 外交部，〈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1958 年 8 月 14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6/430.4/90。

86 主要參考第六十九次投審會會議紀錄及附件資料。外交部，〈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1958 年 9 月 1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6/430.4/92。此外，〈僑外資投資案 又通過四起，日商來臺製容電器〉，《聯合報》（1958 年 9 月 19 日），第 5 版。

87 〈新設公司，上月登記九十七家〉，《聯合報》（1961 年 4 月 28 日），第 5 版。另參見台灣公司網，〈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83639011>。

88 〈正泰水泥廠 已開工生產，旋轉風激冷卻機 現正申請專利中〉，《聯合報》（1961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

89 例如 1963 年臺電某工程需要正泰公司供應水泥，其公文上面簽署的時任公司負責人是岑文華，而非薛國樑或彭翀。參閱〈一九六三年度台電公司電力計畫：南部第三火力發電工程〉（1962 年 10 月 29 日～1964 年 8 月 7 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系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美援會（37.07-52.09） / 美援工業建設 / 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國史館，典藏號：040-010415-0081。

（二）高雄三多高級公寓

承前所述，薛國樑在富國物產時代就開始投注房地產，多年下來繳出亮眼業績，也累積赫赫戰果，在日本不動產業界口碑頗佳。適逢 1970 年代臺灣房地產建築業逐步興盛，許多華僑回國投資興建國民住宅、高樓大廈和觀光旅館等，成為當時熱門的僑資事業。⁹⁰此時薛國樑也加入投資行列，將他在日本實行的宅地營造開發經驗移植至臺灣，與國內建商合作，投資興建公寓住宅，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在自己家鄉高雄市興建「三多高級公寓」。

但這項投資事業一開始就遇到瓶頸與阻礙，主因是針對該公寓所在的土地，遭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提出異議而碰壁觸礁。於是薛國樑在 1975 年 3 月 17 日撰擬抗議書，請亞東關係協會代表馬樹禮主持正義，並請轉呈中央政府協助，以解決華僑面臨的困難。⁹¹

整個事情原委，從薛國樑抗議書中的陳述，略可窺知梗概。他提到，1974 年返國投資，經人介紹向臺灣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以下簡稱衛理公會）合法承購一批土地，位在高雄市前鎮區戲獅甲段的福音新村，計 16 筆面積共 2,449.03 坪，然後分割轉賣並開始興建房屋，詎料此時始被國有財產局提出異議，無異是青天霹靂，讓他蒙受巨大損失。

薛國樑的抗議文語氣相當強硬，更認為國有財產局侵害了愛國華僑的合法權益，吐露出華僑回國投資遭遇困難的無奈和沉痛心聲。但問題的核心是，針對民間的土地買賣，究竟國有財產局為何要提出異議，又提出怎樣的異議，在這份抗議書中並無明示，實有深入理解的必要。而欲釐清整體事件的來龍去脈，亦有必要從土地所在之衛理公會高雄福音新村的前世今生來談起。

戰後衛理公會利用來自美國「布倫茂基金會」的善款，向國有財產局購買位在高雄市前鎮區戲獅甲段共計 42 筆的國有地，經轉報行政院於 1963 年 4 月 9 日核准以「專案讓售」方式承購，並於該處興建「福音新村」，供戰後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籍、香港籍難民，以及臺籍貧民等收容居住。⁹²

90 向誠主編、僑務委員會編印，《僑務五十年》，頁 226；僑務委員會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我國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檢討與改進方向》，頁 9。

91 關於薛國樑的抗議書及公文內容，參閱〈中日僑務（一）〉（1974 年 11 月 8 日～1975 年 4 月 11 日），《外交部》，檔案系列：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僑務／國史館，典藏號：020-190500-0002。

92 張馨文，〈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的在地實踐：以高雄「福音新村」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2～3、31～32；〈基督教臺灣衛理公會 刻在高市興建住宅 完工後即配予貧戶〉，《中央日報》（1963 年 8 月 8 日），第 3 版。

當衛理公會向國有財產局辦理申購土地時的 1962 年 11 月 16 日，衛理公會曾出具切結書載明：「保證依照建築圖樣建築難民住宅及工廠之用，絕不轉售、轉租，或作其他用途，否則聽憑貴處撤銷買賣關係，無息領回已繳款項。」亦即，衛理公會擔保承諾所購得的國有地，將來僅供公益慈善事業使用。⁹³

1970 年代以降，美國教會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本身在財務上發生困難，以致縮減宣教授外計畫。美國衛理公會也決議自 1972 年起不再差派美國會督來臺，並撤回對臺灣相關機構之資助與宣教士，自此臺灣的衛理公會不得不順勢走上自立之路。⁹⁴

臺灣衛理公會為籌措慈善事業發展基金並拓展財源，在 1974 年將原先承購的 42 筆國有地中的 16 筆，轉賣給薛國樑和張復成興建三多高級公寓，這就是上述薛國樑提到向衛理公會購買土地蓋房屋的投資案。然而衛理公會出售土地一事，國有財產局認定違背了當初切結書上「絕不轉售、轉租，或作其他用途」的擔保，只能用於公益事業的承諾，因此國有財產局才會對這項土地交易提出異議。

國有財產局發現衛理公會違約賣地後，於 1975 年 1 月 17 日函知該公會須「維持前議，不得轉售及變更使用」，也向法院申請假處分，但對於已售予薛國樑興建三多高級公寓之土地善後處理，國有財產局乃轉呈行政院核示。結果在 1975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函覆略謂：因顧及衛理公會為宗教團體，倘遽為解約訴請償還價款，恐影響慈善事業之推行，造成社會不安，於是同意衛理公會就已售出之該 16 筆土地，以補繳差額地價方式辦理結案。⁹⁵

如是觀之，薛國樑的抗議似乎有效，最終是由衛理公會補繳差額地價而結案。只是此項回國返鄉的投資案，竟然牽扯到衛理公會與國有財產局之間複雜的土地糾葛問題，這恐怕是薛國樑始料未及的。或許可認為薛國樑和衛理公會的 land 買賣並無違法，關鍵是衛理公會是否違約而引起的交易連帶風波，致使薛國樑不惜以愛國華僑的身分，憤而提出強烈抗議。

93 張馨文，〈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的在地實踐：以高雄「福音新村」為例〉，頁 111。

94 林素鈴，〈基督教衛理公會在臺灣的擴展及其空間性之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6 ~ 27；張馨文，〈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的在地實踐：以高雄「福音新村」為例〉，頁 7。

95 參照 2002 年 11 月 21 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內容（91.11.21. 八十九年度重上字第 507 號民事判決）；2004 年 2 月 26 日最高法院判決書內容（93.02.26. 九十三年度臺上字第 340 號民事判決）；2006 年 8 月 8 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內容（95.08.08. 九十四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5 號民事判決）。此外，張馨文，〈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的在地實踐：以高雄「福音新村」為例〉，頁 111 ~ 112。補充說明：引用之判決書雖係事後衛理公會與國有財產局兩造延續下來的民事訴訟，但內容亦溯及 1974、1975 年間薛國樑購地及興建三多高級公寓的事情始末。

四、參與僑團及華僑事業金融機構

戰後，各種不同性質與名稱的華僑組織紛紛在日本籌組成立，這些出身背景相異的團體和成員，在國際情勢及東亞秩序變動中，成為當時國共雙方極力爭取拉攏的對象。嗣經冷戰結構成形，日本華僑團體在國家政治力量介入下，經歷整併分裂與對立，最終大致呈現三足鼎力的態勢，亦即親國民黨政府的「國府派」、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派」，以及追求臺灣獨立而結成的「獨立派」。⁹⁶

1947 年，薛國樑當選臺灣與大陸華僑合併後的「東京華僑聯合會」執行委員，他自豪地認為這是他踏入華僑社會的第一步。⁹⁷此外，戰後初期薛國樑也加入「留日華僑總會」並擔任常務代表委員，另參與「留日臺灣同鄉會」也被選任為理事；其中「留日華僑總會」於 1951 年因左右分裂，國府派的僑團遂改名為「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1972 年臺日斷交後，再度易名為「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是國府派在日華僑最大的團體，薛國樑在聯合總會著力甚深，付出頗多，之後也分別在 1977 年出任常任副會長，1986 年繼任最高職位的會長。⁹⁸由此可知，薛國樑成為僑界知名貿易商的同時，他也擔任華僑組織的重要幹部，透過華僑社團在僑界建構緊密的人際網絡，逐步嶄露頭角，而且與中國大陸籍華僑及臺灣政府駐外機構維持良好關係，並在「與匪鬥爭」和「對付偽黨」的過程中，採取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從而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

除僑團組織外，薛國樑亦投入在日華僑關連的事業體和金融機構。就前者而言，例如 1953 年 4 月 30 日，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華僑企業「東南商事株式會社」於東京創立，社長是林以文的兄長林以德，薛國樑也是該公司股東之一，其他在日臺灣人股東尚有林以文、李合珠、蘇碧、蔡炎貴等；同年的 1953 年底，林益謙取代吳泗村擔任會社之專務取締役。⁹⁹薛國樑參與東南商事的投資經營，可看出他積極建立人際網絡的企圖心，

96 參閱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北：五南，2015）。

97 薛國樑，〈私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アジア文化》，21（1996），頁 21。

98 以上參見〈薛國樑生平年表〉（未刊稿）。

99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3 年 12 月 4 日），臺灣日記知識資料庫。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8 月 4 日。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

而這些人脈也是他事業發展的重要資本。

關於後者的華僑金融機構，「日華信用組合」是薛國樑主要的活動場域。一般而言，海外各地華僑人脈的構築大致相同，除華僑同鄉會、區域性華僑團體及華僑學校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信用組合這類華僑金融機構。全日本各地有許多由華僑開設的信用組合或協同組合等金融機關，主要目的都是在解決華僑無法向日本金融機構貸款的問題。¹⁰⁰許多華僑從事工商業，必須取得融資才能拓展事業，但華僑為外國人，很難向銀行貸款。雖然日本華僑各自政治立場互異，可是共同組成信用組合，一起開設貿易公司的現象頗為常見。

這些信用組合的運作與華僑經濟活動有密切關聯，而華僑信用組合之中，規模最大的就屬 1958 年成立的「日華信用組合」。依據該組合資料顯示，日華信用組合組合長為金子滋男，副組合長林益謙，理事有辜寬敏、李合珠等，薛國樑則任監事，施朝暉（史明）也是股東之一，組合中重要成員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¹⁰¹根據林益謙的回憶錄中提到，該組合最初是由他主持，但 1967 年日華信用組合改名為協和信用組合後，林益謙就喪失了主導權。¹⁰²

1950、60 年代，不少臺籍華僑在東京籌設信用組合，¹⁰³薛國樑並未自創信用組合，而是長期擔任日華信組改名後協和信組之理事。期間協和信組發生超貸事件時，他曾介入改組重建，但不久又再度爆發經營危機，此次他不再介入，放任協和信組被其他金融機構整併。不論如何，薛國樑的事業經營，曾長期受助於多家華僑經營的信用組合，包括親共人士經營的「日本華僑經濟合作社」也有密切往來。¹⁰⁴由此可知，在商場上日本華僑的經貿網絡跨越政治立場界線。

100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發行，1965），頁 152 ~ 160。

101 吳俊瑩、歐素瑛、陳世局、黃翔瑜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一）》（臺北：國史館，2023），頁 35 ~ 48。

102 林仲光口述，何義麟訪談／記錄，〈林仲光先生口述訪談紀錄〉（未刊稿）。補充說明：該信用組合原為 1950 年設立的「第一勸業信用組合」，1952 年改稱「朝日信用組合」，1958 年由華僑資產家繼承，並改名創立「日華信用組合」，成為以華僑為主的金融機構。1967 年，該機構更名為「協和信用組合」，1984 年改稱「東京協和信用組合」。1994 年，因爆發經營危機的「二信組問題」，「東京協和信用組合」與「安全信用組合」兩機構為處理不良資產，不得不將全部事業讓渡給 1995 年成立的「東京共同銀行」，參見〈薛國樑生平年表〉（未刊稿）。

103 參閱劉正國，《近代在日華僑經濟發展之研究》（臺北：海華文教基金會，2001），頁 176 ~ 179、200 ~ 201。

104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37 ~ 41。另外，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3 年 4 月 14 日，未刊稿。

五、投入華僑教育事業

戰後在日臺灣人與中國大陸出身的華僑，在 1946 年決定合併華僑團體，同時也合力經營華僑學校。薛國樑生前以參與「東京中華學校」的經營為榮，他署名發表的文章中表示，1948 年東京中華學校從京橋遷到四谷，準備購買校地建校，他在三十幾人的營運會議中，宣布捐出 10 萬日圓，因此，1949 年鄭勇昌校長即聘請他擔任理事，他也開始大力協助學校經營。¹⁰⁵ 薛國樑積極投入東京中華學校的營運，與中國大陸出身之華僑也建立豐厚的人脈關係，這是他與眾多臺籍僑領最大的差異。

東京中華學校創立於 1929 年，原名「東京華僑學校」，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關閉，戰後 1946 年復校時借用中央區昭和小學校校舍上課，校名改為「東京中華學校」。1947 年 6 月，該校獲得中華民國僑委會認定為僑民學校，但經費還是以募款方式自籌，主要來源是華僑捐款，¹⁰⁶ 而主持募款事宜大都仰賴寧波同鄉會的長老曹嘉修，他過世之後，支持東京中華學校的主力還是寧波同鄉，薛國樑是捐款理事中少見的臺籍華僑，而且長期擔任副理事長。¹⁰⁷

2024 年出版的《寧波旅日同鄉會七十年の歩み》中，有一章專門探討同鄉會與東京中華學校之緊密關係，內容提到同鄉會與東京中華學校具有特別的因緣，同時也強調薛國樑在學校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¹⁰⁸ 而戰後東京中華學校經營上最大的轉折點，就是 1956 年更換理事長事件。

1956 年，中國大陸京劇名演員梅蘭芳應邀到東京公演，時任東京中華學校理事長的鄭勇昌竟前往日本劇場上臺獻花，這件事情激怒了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命令理事長必須下臺。理事會因此召開會議，經過重新選舉後，寧波籍的張和祥出任新理事長，薛國樑則擔任副理事長。¹⁰⁹ 1957 年，張和祥與薛國樑等僑領組織「京濱華僑文教人員回國考

105 薛國樑，〈追念和祥先生回顧建校的歷史〉，《東華》，8（1993），頁 29～30；〈創校七十周年に寄せて——私の回顧録〉，《東華》，9（1999），頁 26～28。

106 張建國編，《東京中華學校八十年の歩み》（東京：東京中華學校，1990），頁 7～16。

107 〈東京中華學校「歷史勉強會」第三回 陳焜旺氏講演記錄〉（未刊稿，2009 年 3 月 11 日，赤坂維新号）。

108 創立 70 周年紀念誌製作委員會編，《寧波旅日同鄉會七十年の歩み》（東京：寧波旅日同鄉會，2024），頁 190。

109 沈靚鼎，〈對日往事追記（39）〉，《傳記文學》，31（4）（1977），頁 126～129；薛國樑，〈創校七十周年に寄せて——私の回顧録〉，頁 26～28。

察團」回臺訪問，3月29日獲得蔣總統接見（圖5）。¹¹⁰這項「與匪鬥爭」的貢獻，讓薛國樑在華僑的人際網絡中建立穩固的地位。

基本上，東京的僑領大多會捐款給東京中華學校，1956年張和祥出任理事長後，個人就捐獻體育館的建築費；1961年3月30日，張厲生駐日大使頒發獎牌，感謝張和祥與另一位僑領贊助華僑學校基金200萬日圓，而林以文、薛國樑等則各捐100萬日圓，李合珠等亦各捐50萬日圓；1964年，

李合珠個人也曾捐款興建學校游泳池，並命名為「合珠池」。¹¹¹由此可知，臺籍華僑踴躍捐款僑校，但長期擔任學校副理事長的只有薛國樑一人，積極投入僑教事業是他受到各界關注的事蹟之一。



圖5 1957年3月29日，蔣介石總統接見「京濱華僑文教人員回國考察團」，與團長張和祥（前排左二）及副團長薛國樑（前排右二）等成員合照

圖片來源：薛國樑家屬提供。

六、從僑領到僑委

戰後初期，日本僑界經過分立及合併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力圖排除僑團中的左傾分子，重整華僑團體。¹¹²1951年，支持國府的日本華僑最大團體「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選出林以文擔任會長，¹¹³自此林以文成為在日最重要的華僑領袖。1952年對日和約生效後，國共雙方在日本展開激烈的華僑爭奪戰，中華民國政府透過駐日代表團，掌握各地的僑團與華僑學校，但因部分僑團受左翼分子影響而傾向中共，造成不論是僑團、僑

110 薛國樑，〈創校七十周年に寄せて——私の回顧録〉，頁26～28。

111 李林麗美，〈李合珠會長與僑教事業〉，《東華》，5（1989），頁31。

112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華僑志》，頁108。

113 〈13、外交部四十年四月份施政進度報告表 目四 駐日代表團辦理華僑登記及改組全日華僑總會事〉，收於周琇環編，《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臺北縣：國史館，2001），頁137。

校或僑報等，都出現嚴重的分裂與對立。¹¹⁴而此時的薛國樑擔任重組後東京華僑總會的理事，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理事，成為支持國府的親臺派僑團之重要僑領。

1950 年起日本僑界的清共行動，除了要掌握中國大陸籍的旅日華僑外，主要就是拉攏在日臺灣人僑領。戰後成為華僑後的在日臺灣人，由於學歷較高，因此擁有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取得戰勝國民身分後，不僅獲得特別配給，也有較多機會擔任僑團幹部。就如薛國樑或林以文、李合珠等華僑，許多在日臺灣人各顯神通，從事多種類型的貿易活動，包括合法轉賣配給用品，以及非法的黑市買賣等。這些人擁有一定資本後，進而從事娛樂業或不動產投資，累積相當財力者就順理成章成為僑領。

由於 1952 年日本自民黨政府選擇與臺灣國民黨政府簽訂和約，戰後經商致富的在日臺灣人自然與國府保持比較緊密關係。¹¹⁵觀察駐日代表團與之後的大使館政策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就是藉由林獻堂、林以文、李合珠、薛國樑等華僑的人際網絡，掌握僑界中在日臺灣人社群；不僅如此，當面對臺灣獨立運動的挑戰時，國民黨政府還是要尋求臺籍僑領來「對付偽黨」。

根據外交部檔案，國民黨政府情報單位取得情資，獲悉廖文毅準備在 1956 年 2 月 28 日舉行就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典禮。得知此消息之後，駐橫濱總領事館提前於 2 月 21 日在駐日大使館會議室，聚集東京地區僑領召開僑務會議，商討如何對付臺灣民主獨立黨廖文毅的叛國活動。¹¹⁶參加會議中所謂「臺省僑領」，以林以文為首共有 23 名，薛國樑也列名在內，皆屬商界有分量的知名人士，他們同時也是僑團幹部，而且都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臺籍僑領。這樣的僑界動員模式，大約持續到 1990 年代。

綜上觀之，無論「與匪鬥爭」或「對付偽黨」，國民黨政府猶需倚靠臺籍僑領的支持；相對地，為了拉攏這群擁護政府的在日知名僑領，國民黨政府也給予回國投資、考察訪問和拜會國內各單位的機會。在僑領組團返臺參訪行程中，經常可見薛國樑的身影，而每年雙十國慶受邀回臺備極禮遇，甚至有幸獲得層峰接見，更是榮耀加身。對薛國樑

114 何義麟，〈戰後日本華僑團體整合過程之考察〉，收於許文堂主編，《軍事佔領下的臺灣（1945-1952）》（臺北：臺灣教授協會，2017），頁 361～393。

115 有關戰後日本華僑與臺灣人的動向，參閱沈靚鼎，〈對日往事追記（27）〉，《傳記文學》，27（6）（1975），頁 77～78；同〈對日往事追記（34）〉，《傳記文學》，29（6）（1976），頁 120～122。

116 駐橫濱總領事館，〈臺灣獨立運動（二）關於應付臺灣獨立黨開會問題召集僑領開會商討事謹檢附會議紀錄乙份〉（1956 年 2 月 24 日），《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4/006.3/003/1/075。這是臨時召開的會議，並非所有臺籍重要僑領全部到齊，例如李合珠即未參加，但與會者都是僑界重要人物。

這些在日僑領而言，「僑胞回國」不僅是厚植臺日雙邊政商人脈的良機，同時也讓他們在僑居地得以立足穩固，並於僑社風光展現其影響力。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和東京中華學校，是薛國樑在日僑界最專注投入的活動場域，而獲選海外僑委步入政壇，是他在祖國臺灣最活躍的舞臺和時刻。薛國樑循著日本中華聯合總會前輩會長的腳步，¹¹⁷於1989年底獲37個旅日華僑團體聯名推薦，在12月2日被遴選為第一屆第六次的增額僑選立委，¹¹⁸任期自1990年2月1日至1993年1月31日。這段期間，薛國樑逐漸將投資經營事業與生活重心移回臺灣，也開始走向情歸桑梓的感恩返鄉之旅。

陸、旅日奮鬥遊子的歸鄉之路

1986年9月，薛國樑繼任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第三任會長，並在1999年8月榮任名譽會長；繼之於1989年12月，被遴選為增額僑選立委，擔任了一期的海外僑委；而1999年4月，薛國樑更上層樓，如願榮膺東京中華學校的理事長，1990年代的薛國樑可說已達人生的最高峰。

薛國樑在功成名就之餘，仍不忘回饋鄉里，照顧宗族，尤其在世的最後十年，除前期勤跑國會，克盡僑選立委職責之外，泰半時間也常駐故鄉左營，致力於存續及弘揚薛家精神。¹¹⁹本節就薛國樑晚年為家族與故鄉付出的貢獻，分別敘述其重要事蹟。

一、慎終追遠 興建祖園

早期，薛家開臺先祖薛淑仁與先祖母洪氏之祖墳原位於鳳山赤山，而左營廊後薛

¹¹⁷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首任會長林以文，會長任期1951年至1976年，期間擔任2期僑委（1972～1976未完）；第二任會長李合珠，會長任期1976年至1986年，期間也擔任2期僑委（1980～1986）。

¹¹⁸ 〈七十八年第一區東北亞（日本）地區立委候選人薛國樑、張慧琴、李政義〉（1989年～1989年），《僑務委員會》，檔案系列：僑務委員會／僑選中央民意代表／僑選增額立委（1989年）／遴選事務，國史館，典藏號：033-020801-0036。〈僑選立委遴選審核完成 9人連任，20新人上榜，並首度出現藏籍委員〉，《聯合晚報》（1989年12月2日），第1版；〈僑選增額立委名單〉，《經濟日報》（1989年12月3日），第2版；〈僑選立委選定 9人獲選連任 其餘廿名新人〉，《聯合報》（1989年12月3日），第1版。

¹¹⁹ 參見薛博仁於2006年6月27日為《聯合總會紀念文集》撰寫的原稿內容，頁2，家族提供。

氏歷代先人墓塋則散居各處。至日治時期，薛家第四代警覺若不將各先祖遺骨集結重葬，恐有年久遺修之虞，於是在左營菜公庄（今民族路菜公里一帶）覓地建祖墓。此後多年，薛家後代子孫用心維護，期間亦歷經多次整修，每年清明時節宗親皆會齊聚於此祭祀祖先。¹²⁰

然而戰後菜公公墓基地已不敷再葬，加上隨著都市化發展，廢除公墓之議燃起，¹²¹且配合土地重劃之實施，薛家菜公祖塋位址被規劃為公園綠地和公家機關等用地，勢必將面臨拆遷之命運。除此之外，薛家各房系成員漸趨龐大，每至清明掃墓期間，宗親均需奔波多處祭拜各自先人，殊感不便，因而有族人提議重建祖墓，以容納薛氏所有先祖之遺骨。

就在思索籌建家族墓園之際，薛家也進行家系祖譜的調查與整理，其中多數家族響應新建祖園之建議，亦紛紛捐款贊助。¹²² 1991 年清明節，薛家正式展開募款活動，並著手覓地和規劃工程，最終於今日的高雄市田寮區尋得佳地，隨即開始鳩工興建。

薛家祖園在 1991 年 11 月開工，由薛國樑擔任「薛家親族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¹²³歷時三年餘，於 1995 年 4 月竣工，嗣後將所有先祖遺骨集結移奉至此。由於薛家祖園位處山坡地，須重視水土保持等環境問題，而且當時無路可通，因此特地另闢一條道路以利進出，致使施工困難重重，幸賴人才濟濟的薛家眾族出錢出力，熱心攜手相挺，始能如期完工。¹²⁴

薛家祖園擘劃之初，即呼應政府鼓勵興建靈骨塔之政策，採納骨堂方式建造，樓高 5 層，頂樓並預留空間，讓後代子孫可視情形再予加蓋；納骨堂共可容納一萬個塔位，完工後預計可供往後十代子孫使用（圖 6）。此外，祖園也登錄為「薛王廟」，主祀薛

120 郭吉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頁 44 ~ 46。此外，本節有關薛家祖塋遷移，以及「薛家祖園」建造之歷史與過程，主要參考「左營廊後薛家祖園興建紀事碑」（1995 年 4 月 5 日薛國樑題）之碑文說明。

121 李橙安，〈從舊城到新城——高雄都市近郊公墓之初探〉，2021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未出刊，2022），頁 81（註：本處已獲作者同意引用）。另可參閱王御風等著，〈覆鼎金物語——高雄市墓葬史初探〉（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巨流，2018）。

122 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81。

123 同上註，頁 71；「左營廊後薛家祖園興建紀事碑」碑文。

124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記錄，〈圓滿人生：臺北第一高女陳瑤瑤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專刊 1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283。補充說明：陳瑤瑤女士的夫婿為黃天橫先生，是臺南知名的固園黃家，與薛國樑係姻親關係。



圖 6 薛家祖園

圖片來源：薛氏文教基金會提供。

府元帥，¹²⁵ 被視為薛家的共主神明。

薛家祖園可說在薛國樑的號召及主導下，聚集眾族力量努力完成的，同時也是薛家族脈延續的精神象徵，薛國樑眷顧並遺愛世族，功不可沒。他在「左營廊後薛家祖園興建紀事碑」中強調，本祖園是薛氏宗親緬懷先人，撫念祖德之具體表現，也充分展現宗族團結、和諧、不計私利之大我精神，行文間流露出殷切期盼後代以此為典範，黽勉子孫薪火相傳，承先啟後；而 2000 年 4 月 27 日辭世的薛國樑，6 月 19 日亦永眠安奉於此。¹²⁶

二、造福鄉梓 設基金會

在製作祖譜及興建薛家祖園的同時，一方面為日後管理祖園與維護古厝之營運；另一方面也強化薛家親族的凝聚力，薛國樑於 1993 年清明節籌創文教基金會。1994 年 5 月 26 日，經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正式核准成立，法人名稱全銜為「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會址登記在高雄市左營區廊北里海平路 40 號的薛家古厝。¹²⁷

¹²⁵ 蔡振坤總策劃、大觀元有限公司企劃執行，《高雄縣宗教之美專書（下冊）》（高雄：高雄縣政府，2010），頁 410。另，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5 年 10 月 29 日，未刊稿。

¹²⁶ 〈薛國樑先生訃告暨生平事略〉，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550890210003A。

¹²⁷ 以下參見台灣法人網，〈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網址：<https://org.twincn.com/item.aspx?no=3564398>；吳連賞、許燕芬，〈左營觀光遊憩空間與遊客滿意度之研究〉，《高市文獻》，23（3）（2010），頁 62。此外，本節有關「薛氏文教基金會」及其會館興建之歷史與過程，主要參考「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建造紀事」（董事長薛國樑題，無碑刻日期）之碑文說明。

基金會籌備之初，原本係基於緬懷先祖筚路藍縷、胼手胝足之精神，擬組織宗親會以團結親族，嗣後擴大其宗旨目標，朝服務群眾、急難救助，以及弘揚固有道德、傳統孝道與民俗文化等多功能之文教基金會型態發展。¹²⁸換言之，薛國樑規劃的基金會不僅止於狹隘之家族性，而是兼具關懷社會公益的理念，展現民間社團應有之風貌。

薛氏文教基金會首屆董事長為薛國樑，後因薛國樑過世，2001 年 10 月 15 日改由薛國樑五弟薛國泉接任，而在第九屆董事任期中薛國泉辭世，2024 年 2 月 1 日推舉薛國樑堂弟薛藤雄（二房派下薛天全之長男）繼任董事長。該基金會編制董事 5 至 9 名，歷屆董事會成員網羅薛家四房各系，彰顯宗族團結一心、互助融合的象徵，藉此也期待後代子孫能慎終追遠，保存古厝，並留住薛家精神。¹²⁹

薛氏文教基金會設立之初，苦無固定辦公處所可供推展業務之用，於是薛國樑再次集結宗親之力襄贊奉獻，選擇在薛家古厝旁的基地募資籌建基金會會館，響應捐款活動者共約 160 名，橫跨左營廂後第五世至第八世的薛家族人。¹³⁰1994 年 9 月 24 日動土開工，歷時半年於 1995 年完工，為一棟 3 層樓的現代化建築，規劃作為兼具集會、辦公及社區活動之場所（圖 7）。

美輪美奐的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於



圖 7 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

圖片來源：2024 年 11 月 20 日筆者攝。

128 薛氏文教基金會法人登記，即明載成立目的為：以敦親睦鄰（族）、培植人才、保管產業、辦理及推展文化、傳統民俗、傳統技藝、社區發展、社會公益、慈善等活動事業為宗旨。事實上，該基金會秉持創辦之理念，始終積極推廣多項在地活動，如提供各級學校和機關團體的鄉土教學導覽、贊助學校或機關所辦理的各類活動等，而對於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保育與地方觀光發展，更是不遺餘力，成果頗豐。

129 楊玉姿，〈高雄市史蹟賞析〉，頁 140；郭古清，〈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頁 3；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廂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2-19。

130 參考「財團法人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興建捐款人芳名錄」（1998 年 8 月吉置）碑記內容；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7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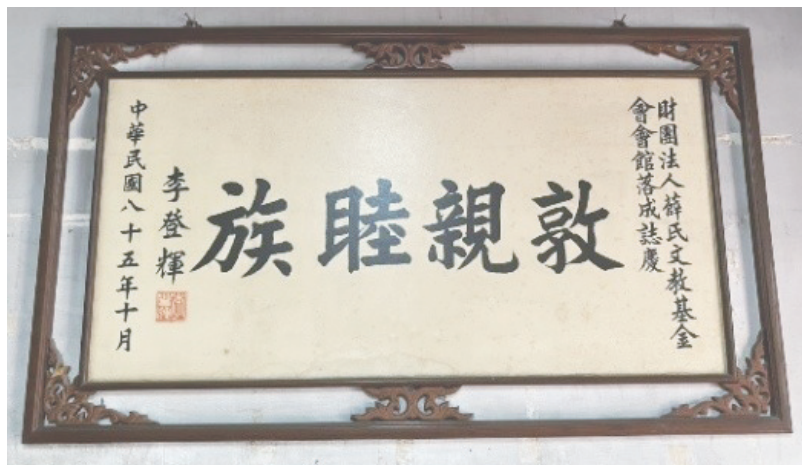


圖 8 李登輝總統贈匾，祝賀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落成
圖片來源：2024 年 11 月 20 日筆者攝。

1996 年 10 月 26 日舉辦隆重的開館典禮，會場冠蓋雲集，盛況非凡，高雄市長吳敦義也蒞臨現場主持落成啟用剪綵，總統李登輝特地贈匾祝賀（圖 8），廊後北極殿管理委員會及各方人士、日本重要僑團等亦獻匾誌慶，顯現薛家豐沛的人脈關係。

三、心繫家園 守護古厝

薛國樑晚年最念茲在茲的事，莫過於他出生成長之地「薛家古厝」的未來。這處承載兩百多年歲月洗禮的祖厝，隨著時光推移、社會文化變遷、周遭環境改易，尤其面對都市發展之衝擊和挑戰，漸趨老化的建築物如何維護，甚至是否存廢等問題，都考驗著薛氏家族。薛國樑會創立基金會，其用意之一也在此，竭力守護家園成了薛國樑與薛家亟待解決的課題。

前述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落成啟用時，薛氏家族趁此機會曾向高雄市長吳敦義陳情，盼薛家古厝能避免因開路而面臨被拆屋的命運，得以保存其完整全貌，¹³¹ 主因是高雄市政府早先規劃在其古厝區擬開闢一條 6 公尺的都市計畫道路，如此一來，薛家古厝部分屋宅勢必將被迫拆除。

¹³¹ 李翰，〈左營薛氏文教會館開館：家族向前來主持剪綵的市長吳敦義請命 盼古厝得以維護並完整保存〉，《中國時報》（1996 年 10 月 27 日），第 16 版。

之後經薛國樑和基金會親族不斷向市長與市議會請命，終於 1999 年 9 月 16 日，在時任高雄市長謝長廷任內的「變更高雄市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決議變更內容，其理由是「為保持薛家百年古厝之完整，原則同意廢除 6 公尺都市計畫道路」。¹³² 此事最後能以圓滿收場，對翌年 4 月離世的薛國樑而言，應該是在世最寬慰的一件事了。

隨著文化資產意識日益抬頭，薛家古厝深具的歷史價值也逐漸受矚目。薛國樑過世後的 2003 年 2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將其公告為「歷史建築」；¹³³ 2014 年 8 月 11 日，高雄市政府再公告薛家古厝為「市定古蹟」。¹³⁴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1936 年興建的古厝右外護龍，亦於 2020 年 8 月 7 日由高雄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築」。¹³⁵

薛家古厝得以保存並普遍受到重視，薛國樑主持成立的薛氏文教基金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至此，薛家古厝在文資法制上獲得政府的協助與保護，使其維持大致完整的樣貌，長年來薛氏文教基金會宗親努力守護家園的成果，正回應了薛國樑耿耿於懷的初衷和最大心願。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柒、結論

綜觀薛國樑的一生，他是風雲時代出眾的商場成功者，因而成為重要的華僑領袖，同時他也是國民黨政府海外的支持者。經過本文考察可知，他擁有的這些特質或經歷，

132 參見《393（案）變更「高雄市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高雄市政府，1999 年 9 月 16 日），頁 53（第七章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意見之研析）、頁 57（第八章實質規劃變更內容）。此項決議案之後亦明載於《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高雄市政府，2008 年 8 月），頁 2-38，以及《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高雄市政府，2025 年 1 月），頁 2-40、3-52、3-59 ~ 3-60。另，薛博仁，〈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頁 81。

133 〈公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舊高雄市役所）」、「薛家古厝」、「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紅樓」、「玫瑰聖母堂」、「陳中和紀念館」、「高雄港車站（舊打狗驛）」、「高雄港港史館」及「舊三和銀行」九處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高市府文二字第 0920010663 號（2003 年 2 月 26 日），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92：春：20，頁 70-71。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廟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1-16、6-2。另參閱柯耀源、鄭敏聰撰文，〈高雄古蹟及歷史建築〉（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 26 ~ 31。

134 〈指定「左營廟後薛家古厝」為市定古蹟。〉，高市府文資字第 10331198101 號（2014 年 8 月 11 日），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103：秋：16，頁 1-4。林世超計畫主持，〈高雄縣市定古蹟「左營廟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頁 1-2、1-16 ~ 1-17、2-44。

135 〈登錄「左營廟後薛家古厝後落右外護龍」為本市歷史建築。〉，高市府文資字第 10931940000 號（2020 年 8 月 7 日），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109：秋：17，頁 1-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左營廟後薛家古厝後落右外護龍〉。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historicalBuilding/20210706000002>。

並非僅依靠戰後在日的機運，實際上是從臺灣鄉土生根發芽，進而枝葉茁壯所結成的碩果；由於其投入的事業與家鄉保持緊密的連結，自然成為堅定支持政府的旅日僑領。再者，他在晚年沒有選擇在日本「落地生根」，而是回鄉「落葉歸根」並回饋故里宗親，這是薛國樑與其他僑領最大的不同。所以，他是日本華僑，也是在日臺灣人，同時也是高雄人。薛國樑原本具有的臺灣人身分以及出身高雄的特質，是探索他生命故事的出發點，研究所有第一代海外臺灣人，同樣也必須從他出生與成長歷程為起點。

戰後薛國樑善用特殊機遇，在日本敗戰廢墟中靠黑市買賣起家而經商致富，而後憑藉其商業手腕並順應時局變動，積極展開臺日經貿事業，也進入在日華僑的人際網絡，成為僑團重要幹部，進而被視為代表全日本的僑領。然而，薛國樑商人資質的養成，無論如何都必須回溯觀察他戰前的成長與求學歷程；換言之，左營薛家農商兼具的祖業經營，本身就提供他從商的環境，而舊城信用組合的職場歷練，以及赴日就讀東京主計商業學校的學習歷程，這些實務技能與專業知識，都是培育他具備商才的重要養分，也為日後的商業經營和投資管理奠定良好礎石。戰後日本華僑的成功，當然會有其特殊際遇，但是其個人的資質與努力也必須釐清，如此才能充分瞭解每個人的生命史。

青少年時期的薛國樑，幸獲李新春與李清漂兩位舅舅，以及公學校師長大貫輝雄的扶攜提拔，不僅在社會體驗中成長，也讓他有機會海外雄飛，拓展視野。縱使短暫的滿洲行未盡順遂，卻能與大貫大八相遇相惜，建立長存友誼，不僅有助於其戰後在日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藉此人脈獲得扭轉命運的契機，讓薛國樑決定轉赴日本留學。爾後，受到高安良雄社長的協助及關照，使得薛國樑能在高安合資會社發揮所長，不可否認，他們都是薛國樑往後在日發展寶貴的人脈資產。

戰後定居日本的薛國樑，其國家認同與投入商貿的行動，可以代表部分臺灣人面對敗戰後日本亂局的肆應模式，甚至可說是多數華僑的行動模式。早期插手黑市交易尋求各種獲利機會，累積個人經濟實力是最佳的選擇，有許多在日臺灣人確實也因而致富。1952年對日和約生效後，在日臺灣人正式脫離日本國籍，但他們並未獲得本國政府的保障，法律地位也曖昧不明，他們必須努力維持貿易活動並與家鄉保持聯繫。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在風雨飄搖之際，政府亟需日本華僑的支持，許多僑民被拉攏後，選擇支持國民黨政府。隨著冷戰與內戰體制的確立，旅日華僑經常被要求政治表態。從留下的紀錄可知，薛國樑選擇支持國民黨政府，由於他已成為僑領，顯然還必須更積極表態。

不可諱言，戰後在日臺灣人不斷面臨重大抉擇，有時可以自主選擇，有時則必須被動表態，每次選擇都會影響其前進的方向。例如 1972 年臺日斷交之際，是否歸化日籍成為在日臺灣人面對的最大難題，而當時薛國樑是選擇不歸化，始終以拿中華民國護照為榮。從本文探討可知，戰後華僑在商場處境相當嚴峻，每個人只要投入商場，就必須跨越政治立場，同時不分僑界幫別，大家以資本主義的原則競合，而非以意識形態進行對抗。但是，回顧戰後的在日臺灣人，他們面對極為困頓的情勢，能夠克服諸多艱難境遇成就一番事業，在歷史上應該留下他們奮鬥歷程的紀錄。

以薛國樑為代表的這類型在日臺灣人，一般被視為華僑研究的對象，以致被臺灣史學界所忽略。因此，不但其生平事蹟不完備，即使有提及他的名字，其事蹟也都是零碎而不完整。他們到底如何從戰敗日本的廢墟中站起來，如何以華僑身分維持與臺灣的聯繫，其生命史也是臺灣史的一部分，值得詳加記錄。1990 年代的薛國樑，囊括僑團總會會長、華僑學校理事長及僑選立委三項職務，這都是日本僑界極為尊榮的職位。除此之外，他也積極返臺回饋鄉里，照顧宗親，無論回國投資或興建祖園、籌設基金會和守護古厝，薛國樑具有相當的行動力，其目標也都能圓滿達成。

總括而言，薛國樑的人生恰如一個圓，從左營出發，在左營結束，任其時空如何轉變，故鄉始終是他最圓滿的歸著點。薛國樑不僅是旅日僑領，亦為海外臺灣人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高雄地方重要的歷史人物，其事蹟更值得載入高雄史冊，廣為周知。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 檔案

- 〈一九六三年度台電公司電力計畫：南部第三火力發電工程〉（1962年10月29日～1964年8月7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系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美援會（37.07-52.09）／美援工業建設／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國史館，典藏號：040-010415-0081。
- 〈七十八年第一區東北亞（日本）地區立委候選人薛國樑、張慧琴、李政義〉（1989），《僑務委員會》，檔案系列：僑務委員會／僑選中央民意代表／僑選增額立委（1989年）／遴選事務，國史館，典藏號：033-020801-0036。
- 〈中日僑務（一）〉（1974年11月8日～1975年4月11日），《外交部》，檔案系列：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僑務，國史館，典藏號：020-190500-0002。
- 〈各種學校台帳（商業）〉：文部省實業學務局列冊資料，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 〈薛國樑先生訃告暨生平事略〉，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550890210003A。
- 「有限責任舊城信用組合設立」（1920年3月1日），〈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十六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064001。
- 「東京主計學校名稱變更（文部省告示第42號）」（1934年2月16日），《官報第2136號》，大藏省印刷局（東京）。
- 外交部（1958年8月14日），〈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6/430.4/90。
- 外交部（1958年9月17日），〈外國人及華僑投資事件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6/430.4/92。
- 僑務委員會（1959年12月16日），「前准投資設立全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撤銷希知照」，〈投資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048/003160/52/0001/024。
- 僑務委員會（1957年9月10日），「據旅日僑商薛國樑呈為來臺投資設立全華實業公司請增加建廠預算并准輸入出售物資函請查照核辦由」，〈投資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046/003160/51/0001/010。
- 駐橫濱總領事館（1956年2月24日），〈臺灣獨立運動（二）關於應付臺灣獨立黨開會問題召集僑領開會商討事謹檢附會議紀錄乙份〉，《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3000000B/0044/006.3/003/1/075。

(二) 書籍

- 立志成功研究會編（1915），《實行容易無資本小資本實業成功法》，東京：安祿書店。
- 吳俊瑩、歐素瑛、陳世局、黃翔瑜編輯（2023），《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一）》，臺北：國史館。
- 首藤佐七（司誠）（1916），《小學卒業後の立志成功寶典》，東京：司誠堂代理部。
- 作者不詳（1907），《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

(三) 報導

- 〈生めよ殖せよの國策型 高雄市で表彰された子寶部隊〉（1942年2月13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岡山郡産組 實務競技〉（1935年10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夕刊，第4版。
- 〈信用組合總會〉（1920年3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二、專書

(一) 中文

- 王永志總編輯（2000），《舊城壹世紀：高雄市舊城國小一百週年校慶特刊》，高雄：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
- 王御風等著（2018），《覆鼎金物語——高雄市墓葬史初探》，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巨流。
- 向誠主編、僑務委員會編印（1982），《僑務五十年》，臺北：僑務委員會。
- 朱政光總編輯（2000），《楠樹百年 梓耀千禧：高雄市楠梓國小一百週年校慶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楠梓區楠梓

國民小學。

何義麟（2015）。《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北：五南。

林琇梅等撰稿，陳妙瓊、王華瑾執行編輯（2006）。《史蹟高雄》。高雄：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周琇環編（2001）。《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臺北縣：國史館。

柯耀源、鄭敏聰撰文（2004）。《高雄市古蹟及歷史建築》。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胡健國主編（2000）。《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二輯》。臺北縣：國史館。

許文堂主編（2017）。《軍事佔領下的臺灣（1945-1952）》。臺北：臺灣教授協會。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記錄（2021）。《圓滿人生：臺北第一高女陳瑤瑤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專刊 1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郭吉清（2012）。《廊後舊影——薛家珍藏左營老照片專輯》。高雄：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

陳子敬撰稿，顏嘉億等執行編輯（2012）。《高雄文明史——史蹟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曾光正（2004）。《左營歷史照片暨古文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1965）。《日本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發行。

楊玉姿（2009）。《高雄市史蹟賞析》。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1993）。《我國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檢討與改進方向》。臺北：臺灣經濟研究院。

劉正國（2001）。《近代在日華僑經濟發展之研究》。臺北：海華文教基金會。

劉淑靚（2001）。《臺日蕉貿網絡與臺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臺北：稻鄉。

稻葉佳子、青池憲司著，黃耀進譯（2020）。《臺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臺北：凌宇。

蔡振坤總策劃、大觀元有限公司企劃執行（2010）。《高雄縣宗教之美專書（下冊）》。高雄：高雄縣政府。

（二）日文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2003）。《新訂 政治家人名事典 明治～昭和》。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

中央大学（1956）。《中央大学學員名簿》。東京：中央大学學員課。

白門紳士録刊行会編集（1976）。《白門紳士録》。東京：白門紳士録刊行会。

主計學園編纂（1933）。《主計學園五十年志》。東京：主計學園。

交詢社出版局編（1963）。《日本会社録 第 3 版》。東京：交詢社出版局。

河野孝行（1966）。《バナナの国・台湾》。兵庫：食品市場新聞社。

東京華僑聯合會（1949）。《東京華僑聯合會會員名簿》。東京：東京華僑聯合會。

帝国秘密探偵社編（1943）。《大衆人事録 第 14 版 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国秘密探偵社。

帝国秘密探偵社編（1953）。《大衆人事録 第 16 版 全国篇》。東京：帝国秘密探偵社。

帝国興信所編（1957）。《帝国銀行・会社要録第 38 版》。東京：帝国興信所。

栃木県歴史人物事典編纂委員会編集（1995）。《栃木県歴史人物事典》。栃木：下野新聞社。

張建國編（1990）。《東京中華學校八十年の歩み》。東京：東京中華學校。

創立 70 周年紀念誌製作委員會編（2024）。《寧波旅日同鄉會七十年的歩み》。東京：寧波旅日同鄉會。

楊文魁編纂（1993）。《日本華僑紳士録》（初版）。東京：華僑新報社。

薛博仁（2000）。《父の想い出：父・薛國樑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の覚え書き》。東京：私家版（未刊）。

三、期刊雜誌

（一）中文

吳連賞、許燕芬（2010）。〈左營觀光遊憩空間與遊客滿意度之研究〉，《高市文獻》，23（3），頁 46～85。

李林麗美（1989）。〈李合珠會長與僑教事業〉，《東華》，5，頁 31。

沈靚鼎（1975）。〈對日往事追記（27）〉，《傳記文學》，27（6），頁 77～82。

沈靚鼎（1976）。〈對日往事追記（34）〉，《傳記文學》，29（6），頁 117～122。

沈靚鼎（1977）。〈對日往事追記（39）〉，《傳記文學》，31（4），頁 126～129。

徐珮瑛（2022）。〈僑資會與臺灣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僑資會訊》為中心的探討〉，《洄瀾春秋》，17，頁 15～36。

廖德宗、洪親慧（2022）。〈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臺灣文獻》，73（1），頁 211～261。

薛順受訪（1983）。〈高雄探索：三進院落的薛家古厝〉，《高雄畫刊》，4（4），頁 16～18。

(二) 日文

- 西山伸 (2015) · 〈1939 年の兵役法改正をめぐって——「学徒出陣」への第一の画期として——〉 · 《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 · 13 · 頁 43 ~ 54 。
- 西山伸 (2017) · 〈戦時期における高等教育機関の在学・修業年限短縮について〉 · 《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 · 15 · 頁 19 ~ 32 。
- 薛國樑 (1993) · 〈追念和祥先生回顧建校的歷史〉 · 《東華》 · 8 · 頁 29 ~ 30 。
- 薛國樑 (1996) · 〈私と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 《アジア文化》 · 21 · 頁 21-22 。
- 薛國樑 (1999) · 〈創校七十周年に寄せて——私の回顧録〉 · 《東華》 · 9 · 頁 26 ~ 28 。
- 鍾清漢 (2000) · 〈華僑の誇りに生きた薛國樑会長の生涯〉 · 《アジア文化》 · 24 · 頁 164-174 。

四、學位論文

- 林素鈴 (2002) · 〈基督教衛理公會在臺灣的擴展及其空間性之詮釋〉 ·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輝閔 (2012) · 〈日治時期舊城公學校之研究〉 · 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馨文 (2010) · 〈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的在地實踐：以高雄「福音新村」為例〉 · 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新聞報刊 (依時序排列)

- 〈華僑投資 昨准兩起〉 (1956 年 4 月 13 日) · 《聯合報》 · 第 4 版。
- 〈全華實業公司 廠房開始興建〉 (1956 年 9 月 4 日) · 《徵信新聞》 · 第 2 版。
- 〈全華紡織廠 下月開工生產〉 (1957 年 10 月 16 日) · 《聯合報》 · 第 2 版。
- 〈僑外資投資案 又通過四起 · 日商來臺製容電器〉 (1958 年 9 月 19 日) · 《聯合報》 · 第 5 版。
- 〈新設公司 · 上月登記九十七家〉 (1961 年 4 月 28 日) · 《聯合報》 · 第 5 版。
- 〈從尼龍到奧龍 再進到帝特龍 · 混紡辦法互有不同 技術成品日新又新〉 (1961 年 10 月 30 日) · 《聯合報》 · 第 5 版。
- 〈正泰水泥廠 已開工生產 · 旋轉風激冷卻機 現正申請專利中〉 (1961 年 11 月 28 日) · 《聯合報》 · 第 5 版。
- 〈基督教臺灣衛理公會 刻在高市興建住宅 完工後即配予貧戶〉 (1963 年 8 月 8 日) · 《中央日報》 · 第 3 版。
- 〈僑選立委遴選審核完成 9 人連任 · 20 新人上榜 · 並首度出現藏籍委員〉 (1989 年 12 月 2 日) · 《聯合晚報》 · 第 1 版。
- 〈僑選立委選定 九人獲選連任 其餘廿名新人〉 (1989 年 12 月 3 日) · 《聯合報》 · 第 1 版。
- 〈僑選增額立委名單〉 (1989 年 12 月 3 日) · 《經濟日報》 · 第 2 版。
- 李翰 (1996 年 10 月 27 日) · 〈左營薛氏文教會館開館：家族向前來主持剪綵的市長吳敦義請命 盼古厝得以維護並完整保存〉 · 《中國時報》 · 第 16 版。
- 陳璧琳 (1999 年 11 月 24 日) · 〈父親在此手植榕樹 他的快樂童年在此度過：舊情綿綿 薛國樑飛回母校〉 · 《中國時報》 · 第 17 版。
- 陳璧琳 (1999 年 11 月 24 日) · 〈榕樹爺爺 90 歲 舊城國小獻壽蛋：小朋友賀卡與手繪彩色蛋掛滿枝桠 校園喜洋洋也為百年校慶暖壽〉 · 《中國時報》 · 第 17 版。
- 王瑞伶 (2000 年 4 月 12 日) · 〈老街老厝老故事：瞧 · 一座務農家族的古厝〉 · 《聯合報》 · 第 39 版。

六、研究計畫

- 李澄安 (2022) · 〈從舊城到新城——高雄都市近郊公墓之初探〉 · 2021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未出刊。
- 林世超計畫主持 (2020) · 〈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廊後薛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 (出版) 。
- 何義麟、王耀德 (2025) · 〈左營薛家源流與薛國樑海外發展史調查研究〉 ·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未出刊。

七、口述訪談

- 林仲光口述 · 何義麟訪談 / 記錄 · 〈林仲光先生口述訪談紀錄〉 (未刊稿) 。
- 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3 年 4 月 14 日 · 未刊稿。
- 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4 年 10 月 17 日 · 未刊稿。



薛家族人訪談紀錄：2025 年 10 月 29 日，未刊稿。

八、網路資料

中央大學官網，〈中央大學年表〉。資料檢索日期：2025 年 3 月 28 日。網址：<https://reurl.cc/5KGKxM>。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左營廊後薛家古厝〉。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14081100000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左營廊後薛家古厝後落右外護龍〉。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historicalBuilding/20210706000002>。

台灣公司網，〈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83639011>。

台灣法人網，〈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宗祠文教基金會〉。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網址：<https://org.twincn.com/item.aspx?no=356439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3 年 12 月 4 日），臺灣日記知識資料庫。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8 月 4 日。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文化資產網，〈左營廊後薛家古厝〉。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s://heritage.kcg.gov.tw/KhccHeritageWebSite/CulturalAssets/AssetsSearchDetail/0be3a97d-6959-4949-8bb3-d7127b7c280d>。

薛氏文教基金會部落格。網址：<https://sheethub.com/data.kaohsiung.gov.tw/%E6%96%87%E5%8C%96%E8%B3%87%E7%94%A2/uri/31529630>。

九、其他

〈東京中華學校「歷史勉強會」第三回 陳煜旺氏講演記錄〉（2009 年 3 月 11 日）。未刊稿，赤坂維新号。

《南臺灣的守護與見證：左營舊城城隍廟》廟誌，左營鳳邑舊城城隍廟提供。

「左營廊後薛家祖園興建紀事碑」（1995 年 4 月 5 日薛國樑題）。

「財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建造紀事」（董事長薛國樑題，無碑刻日期）。

「財團法人薛氏文教基金會會館興建捐款人芳名錄」（1998 年 8 月吉置）。

「舊城城隍廟沿革」（左營鳳邑舊城城隍廟正殿內壁飾）。

2002 年 11 月 21 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內容（91.11.21. 八十九年度重上字第 507 號民事判決）。

2004 年 2 月 26 日最高法院判決書內容（93.02.26. 九十三年度臺上字第 340 號民事判決）。

2006 年 8 月 8 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內容（95.08.08. 九十四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5 號民事判決）。

〈公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舊高雄市役所）」、「薛家古厝」、「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紅樓」、「玫瑰聖母堂」、「陳中和紀念館」、「高雄港車站（舊打狗驛）」、「高雄港港史館」及「舊三和銀行」九處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2003 年 2 月 26 日），高市府文二字第 0920010663 號，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92：春：20，頁 70-71。

〈指定「左營廊後薛家古厝」為市定古蹟。〉（2014 年 8 月 11 日），高市府文資字第 10331198101 號，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103：秋：16，頁 1-4。

〈登錄「左營廊後薛家古厝後落右外護龍」為本市歷史建築。〉（2020 年 8 月 7 日），高市府文資字第 10931940000 號，可見《高雄市政府公報》，109：秋：17，頁 1-4。

高雄市政府（1999 年 9 月 16 日），《393（案）變更「高雄市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高雄市政府（2008 年 8 月），《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高雄市政府（2025 年 1 月），《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左營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廖德宗（2022 年 10 月 26 日），〈探索左營古厝特殊門額〉，發表於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講座。

薛氏文教基金會（1997），〈薛氏先祖出生、忌辰紀錄表〉。高雄：私家版（未刊稿）。

薛博仁於 2006 年 6 月 27 日為〈聯合總會紀念文集〉撰寫的原稿內容，家族提供（未刊稿）。

薛博仁，1970 年代富國物產株式會社公司資料，家族提供（未刊稿）。

薛賽及薛家戶籍資料，家族提供（未刊稿）。